



中國當前的 社會矛盾和鬥爭

——寫在「六四」

十二週年之前

■《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觸動了北京的政治神經。

爭取全港普選特首！ 制訂最低工資法例

從撞機事件看中美關係 匈牙利左派巡禮

華爾街持續增長之夢 資本主義環境危機

越南勞務輸出醜聞 哈薩克左派工運近況

梵蒂岡為反猶教皇行宣福禮

資本主義新生產秩序誕生了？

亟需制訂最低工資等法例

振言

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從成立以來都是在偏幫資本家，讓他們以「自由競爭」名義盡量剝削工人、壓搾窮人，但卻不肯多制訂法例去保障貧苦大眾勞工的權益。這種做法日益加劇社會的分化，導致貧富懸殊的情況十分嚴重。但高官至今仍謊稱現有法例已足夠保障勞工的權益。

無法例阻止工資不斷降低

現有法例不足以保障工人，有大量的事實可作證明。其中最明顯的，是港府一直拒絕設立最低工資制，致使廣大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低，得不到法例約束資方而保障勞方應有合理的收入，因而使資本家大獲其利。政府本身又是大僱主，在「資源增值」的指令下，轄下各部門主管便千方百計在僱員、尤其是新僱員身上打主意，壓低其薪酬待遇。例如，它今年要招

聘的計劃助理員，月薪便只有5千元。坐擁4千多億港元財政儲備的港府尚且如此帶頭壓低薪酬，其他以牟利為目的的工商等行業自然會跟風學樣，更加壓低工資了。

政府的大工程公開競投的準則為「價低者得」，許多外判服務工作也是這樣。這樣的準則間接地造成更多的廉價勞工、工人被迫要受承包公司和二判等的多重剝削。政府為了本身的「資源增值」（明白地說，為了從工人身上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同時為了方便於獲判老闆的剝削，更加拒絕制定最低工資的法例去保障工人。

在這樣的官商勾結之下，加上失業者眾（即使是官方的保守數字，今年3月止也有15萬4千人失業，失業率為4.6%，實際上會遠不止此），便更加把工資水平推低，許多貧苦勞工為了飯碗被迫要受非常苛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8卷 第2期（總第205期）

2001年6月1日出版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刻的待遇條件。不久前報章揭露出食物環境衛生署外判的一位公廁清潔工人時薪只有7元，每日工作14小時，以日薪計算，每月收入共約3千元，無任何勞工福利，且要住在公廁內^{<1>}。稍後，另有一位同樣公廁清潔工人向勞工處投訴，他工作兩年多只放過5天無薪例假，每日工作也是14小時，最近退休才敢追討僱主所欠法定假期工資近6千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宣稱，該會有5宗同類型的剝削個案^{<2>}。港府變相成為本港最大的剝削勞工的僱主，據估計現時約有20萬工人受僱於政府及半官方機構的外判商而受到這種剝削。

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去年第4季，全港共有291,300人月入工資為4千元以下，3千元以下的有80,900人（更低收入的工人數字則據說沒有統計數字）。這項數字應是很起碼的，過去其他民間機構和工會對失業、半失業等的調查統計顯示，總是大大高於官方的統計數字的。

而「低處不算低」！不少外籍家庭傭工常被揭發出月薪只有2千元或以下；4月23日《星島日報》記者報道，一位新來港婦女也遭僱主壓低月薪至2千元，便是這座「冰山」的另一角。

勞工月入幾千元，實在難以維持自己的衣食住行所需，更不必說養家活兒了！以住屋來說，即使是政府的公屋，月租至少也要近千元，新的公屋租金更貴，佔去一個勞動力月入的不小部份。這些低薪勞工家庭實在已跌入赤貧戶之列了！

加劇社會矛盾和分化

由於工資不斷低跌，便加劇了社會分化，產生了窮人責窮人、鬥窮人的可悲現象。城市大學一班學生最近訪問了470名市民，顯示有45%受訪者認為新來港婦女搶去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63%認為她們拉低本地勞工的工資。但根據政府的統計，新來港婦女參與勞動的人數，只佔全港143.6萬婦女勞動力的3.9%不到，不足以形成搶飯碗的威脅或拉低本地人的工資水平^{<3>}。而參與勞動的5萬多內地來港婦女中，很多都是受僱於家庭，有如其他外籍家務助理一樣。同時，拉低工資的根本原因，是港府遷就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需要，不肯制訂最低工資制。可是，部份由於誤解和偏見，部份由於當局過去渲染誇大內地居民

「湧」來港而造成的歧視內地人成見，上引的城大學生調查又發現，有69%的受訪者表示「香港人有歧視新來港婦女」；有超過40%認為後者大部份都有領取綜援，即指她們「分薄」了港人的福利資源，但事實上只有一成（綜援）的個案屬新來港人士^{<4>}。

至於「窮人鬥窮人」的事例，是由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在「我愛香港二千」論壇上說出的：職工盟早前替一群房署屋村的管理員爭取到從12小時減至8小時工作，月薪為4千元。其後為一批月入6千多元的電視技工爭取反對取消假日超時工作津貼，但那些管理員卻反對職工盟替技工們爭取權益，認為他們的工資很高，自己才算慘。（其實、必須把低工資爭取到提高，走向高工資水平，而不是把原有較高工資拉低，才能有利於整體工人階級爭取改善待遇。）

許多法例亟需從速制訂

不僅僅是對最低工資制，港府而且不願立例限制過長工作時間；不願規定工人有集體談判權和自由罷工權，以幫助勞工更團結更有力地與僱主談判改善待遇；也不願立例堵塞現行法例的漏洞，以免資方利用來增加對勞工的剝削（例如對連續工作日數不足或非全日制的工人不獲保障，等等）。它更不肯制定累進利得稅，以便使高收入富有者多負擔而減低中下層市民的重擔。它多年來漠視貧窮問題，且不肯訂立貧窮線；在它的劫貧濟富政策加劇了貧富懸殊之後，它又無實際有效措施去扶助貧民、改善貧民生活；對於香港的種族、年齡、性別等歧視問題，它也沒有有效地制訂反歧視法例，等等。反之，對於一小批法輪功學員在港的和平練功活動，港府高官卻虎視眈眈，費盡心機企圖找到立法「理由」加以壓制，收緊香港的自由、人權空間。這些都是港府倒行逆施的部份事例，必須港人群起而迫使它改正錯誤，從速制訂上述的各種保障勞苦大眾權益的法例！

2001年5月1日

註釋：

<1> 2月20日《蘋果日報》

<2> 4月10日《蘋果日報》

<3> 4月23日《文匯報》

<4> 同上報

團結起來，爭取全港普選特首！

本刊評論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明年秋換屆，第一屆人選問題已成眾所關注的事。首任特首3年多來政績的差劣、施政的諸多錯失、民望的日益低落，可說是「有目共睹」的事。這都是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所產生的結果。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第二屆行政長官仍然由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再次剝奪港人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民主權利，完全違反了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25條凡屬公民均應有自由選舉權利的規定，而這一公約是中國政府已通知聯合國予以遵守的，香港在回歸前早已確認了聯合國這些人權公約；港府發言人今天也聲言香港政府會「忠實履行」它。

特區政府最近向立法會提出了特首選舉草案，由現有的800人選舉委員會兼任選出第二屆特首的職能。這種「雙重職能」在過去沒有明確宣佈，而是等待有利時機，不久前才宣佈，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對此「承認做得不好，深表歉意」。

草案一些具體規定，表明是對其他有意參選者（例如民主黨派）不利、而對董建華參選連任有利的。例如，政黨人士參選須聲明是以個人身份參選，當選後則須退黨，他的提名人的資料須公開，後一點等於進行公開記名的預選，把原本規定的不記名投票隨意作出局部的改變，從而使得許多原擬提名其他候選人的選委會委員感到政治壓力，以致改變初衷，等於變相迫使他們表態支持董建華。民主派要得到100提名人的機會將因此而大減。

特別是錢其琛今年3月明確表示支持董特首連任，已清楚顯示了中央對第二任特首的決定，非常有利於他的連任，對其他有意參選者很不公平。

現時的選委會，由於中央的精心設計、刻意安排，以致絕大多數成員都是保守的「上流社會」代表和親京人士，他們之選舉中央所明白支持的「候選人」已確定無疑。一些著名的鉅商富豪也急忙宣稱支持他連任。

在這種結局已定的形勢下，大有可能無人參加

「陪跑」，而讓他自動當選連任；但當局卻預留1,046萬元公帑，作為選特首的開支，這如果與3百萬選民選30名立法會議員用了4,060萬元相對照，更顯出是對社會財富的很大浪費！

對於首任特首施政的錯誤過失，尤其是他偏重維護工商業者富人的利益、漠視低下階層市民的權益、加劇社會的貧富懸殊，我們3年來已在本刊不斷加以揭露和指責，這些指責與港人對他的不滿是相一致的。他在許多民意調查中的民望不斷低落，也如實地得到反映。試舉最近的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所作的民調為例，他們在3月底至4月初訪問了830名市民，結果顯示，特首的民望持續下跌，滿意他的表現的只有31%，與滿意已提出辭職的陳方安生表現的有85%相差很遠，不希望他連任的則高達47%。這個結果，相信是很有代表性的。

他雖然至今尚未宣佈不會競選連任，但有跡象表示他是繼續戀棧這個權位，樂此不疲的。倘無意外事件打斷他的計劃，則他最後將會連任。倘真如此，更多更大的施政錯失將會持續發生，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將會蒙受更多更大的損害。

為了維護港人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我們呼籲市民及其社團組織立即行動起來，團結一致，組成聯盟，以共同爭取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第二屆特首（以及立法會全體議員），發揮和表現出全港絕大多數市民的這個意願，促使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及其附件的有關規定。

2001年4月23日



（圖片來源：信報）

公民抗命無罪！ 侵犯公民自由可恥！

抗議判處古思堯、梁國雄及吳恭劭 三名「街頭戰士」入獄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西區裁判署判處三人「藐視立法會」罪名成立，隨即被監禁七日，顯示特區政府肆無忌憚，以言入罪，剝奪市民和平請願及抗議的基本人權。

自特區成立至今，施政失誤頻頻，他們三人在立法會內高喊的口號，正反映普羅大眾的聲音，即行政及立法機關並非由普選產生，其所制訂的政策以「大商家、大財團」的利益為依歸。因此，他們行使公民抗命權，何罪之有呢？

此外，特區政府透過法律的手段檢控及制裁三名「街頭戰士」，顯然是容不下任何異見，象徵回歸後高壓管治的來臨。

我們對此表達最強烈的抗議，並要求：

- (一) 立即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 (二) 停止一切政治檢控及迫害，保障市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及自由。

何俊仁	李卓人	鄭家富	梁耀忠	陳偉業	林森成	馮智活	陳勁松	梁鳳群	徐百弟
溫樹南	鄭其健	林浩揚	林灼光	郭少萍	陳多偉	雷玉蓮	陳寶瑩	鄺國全	楊鵬展
陳國樑	劉山青	宋治德	Sunny Leung	曾偉烈	陶君行	唐婉清	陳妙德	阮文煊	陳麟
孔令瑜	黎紹珍	馬楚明	鄧徐中	傅炳榮	方約恒	陳小萍	莫妙英	伍國雄	羅就
張允提	梁永權	陳漪珊	梁錦祥	Chine Chan	吳靄儀	黃錦歡	胡美蓮	袁凱欣	馮家強
李詠芝	蔡雪華	盧偉明	盧遂意	江亮	余少甫	陳昌	呂志文	成偉邦	溫祖堯
蔡嘉文	鍾漢強	莫佩嫻	莫濤	陳仕強	龍緯汶	甘浩望	鍾金勝	李衍琉	李少玲
利建潤	周樹德	黎麗霞	Stanley Ng	劉仲廷	譚聲雷	楊少炎	梁小嫻	王瑞瑩	鄭智雄
曾健成	伍光傑	柯華冰	林榮江	黃英洋	黃清和	盧葉堂	梁有方	蔡耀昌	李海天
Wong Kit Ching	符偉樂	黃仲棋	范國威	劉碧堅	郭少芳	Eric Wong	何長輝	葉家聯	劉子濂
梁廣昌	翁成光	黃靜文	文德全	羅淑玲	葉添強	李偉文	丁弢	關振邦	岑麗芳
歐小芬	許勝利	葉景輝	陳清華	吳本篤	司徒華	麥海華	蕭亮光	司徒勝	馮競文
張潔華	姚雲鵬	黃海欽	王志明	呂亞森	譚清蓮	吳慧玲	曾春旭	蔡民財	張文慧

四五行動
新衣導報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所羅門亞洲通訊社

社會民主論壇
羅照輝議員辦事處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古桂耀街坊服務處

i Concern
香港民主之聲
反失業反貧窮聯盟
基層發展中心

全民制憲學會
中國自由民主黨
街坊工友服務處
工友權益聯社

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和鬥爭

——寫在「六四」十二週年之前

張開

在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十二週年快將來臨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民生鬥爭的歷程，揭露並譴責統治者對民主人權鬥士殘酷迫害的罪行。

中國政府為要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全球化，在各國多方面的壓力下，於1997年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成為締約國；經過3年多的拖延之後，今年2月底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加以批准（卻保留對其中第8條的不同意）；而對於1998年簽署了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則仍然沒有加以批准。中國政府企圖通過對公約的形式上簽署，敷衍應付了各國朝野催促它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壓力；但在實際上，近一年來的許多事實都表明，它依然在迫害進步人士和異議者，人權狀況繼續在倒退。

中共不斷迫害人民

近年來，人民被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或「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拘禁，其重要的事例有：

一、加緊剝奪出版自由，拘捕新聞及網站工作者。國際保護記者協會統計，單是在去年，中國囚禁了多達22名記者，是世界各國拘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中國一個網站「天網尋人」主持人黃琦，因去年「六四」前登載民運消息而被拘控，在獄中受盡折磨，今年2月被正式起訴；北京大學畢業的電腦工程師楊子立設立一個網站刊出自由主義的文章，便被國安部拘捕；

二、加強鎮壓法輪功和中功等組織，踐踏結社和宗教自由。一年來法輪功學員常在天安門廣場等地練功或示威，不畏懼被鎮壓，而當局一發現他們便立即拘捕，視他們為主要的刑事罪犯，許多人被判幾年徒刑；

三、繼續剝奪組黨自由，囚禁中國民主黨30多名成員；其創辦人之一吳義龍妻子單稱峰，因聯同28名人士致書奧委會，要求該會促使北京釋放王有才、吳義龍等人，便在去年底被拘留，今年2月被公安判

以勞教兩年；去年7月7日，民主黨人陳忠和及蕭詩昌被武漢市法院以「顛覆罪」判刑7年及5年半；

四、繼續剝奪言論自由，拘禁民主人士：八九學運期間學生對話團團長江棋生，因撰文要求平反六四，再次被捕判刑4年；河南一位律師沈宏祺（音譯）向報社寄出兩篇支持民主的文章，便遭判刑3年半；河北著名自由撰稿人綦彥臣向香港《開放》雜誌投稿，主張政治改革，也被判刑4年；

五、收緊思想學術研究自由，拘捕從事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和知識份子。最近揭露出來的香港及海外學者徐澤榮、覃光廣、高瞻、李少民、吳建民等先後被國安部拘捕，轟動了國際，經過多月仍沒有釋放或公開審判。據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指出，從去年7月至今，已有24名學者或知識份子被國安部拘捕。在北京，剛從大學畢業的靳海科、徐偉、張洪海三人成立「新青年學會」的學術組織，進行學習研究，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在最近被國安部逮捕。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是其中一小部份。由於中國當局的秘密逮捕、任意關押、無公開審判、封鎖新聞，我們只能從「漏網」的海外記者及傳媒報道中獲悉部份事實。但即使是這些不完全的案例，也已足以證明，近年來的中國人權狀況並無改善，並不因為中國政府已簽署了兩個國際公約而收斂起它對人民的迫害、鎮壓，反之，在許多方面更是收緊控制、加強壓迫的。

加強鎮壓是統治危機的反映

中國政府這種做法，其實並不顯示它的強大有自信、統治穩定，而恰恰是反映它的外強中虛、缺乏信心、懼怕自己的政權會得到可悲的結局，像10年前蘇聯東歐劇變、和不久前南斯拉夫總統選舉中人民趕走了死硬獨裁者米洛舍維奇那樣，因此要急求穩定政權的對策，從而要加強對政治、思想、傳媒和人民的控制。

關於這些對本身統治危機的恐懼感、缺乏安全信心，也可從下述兩方面的問題得到反映和佐證。

其一是治安形勢的更趨嚴峻，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使中共中央決定再次佈署新一輪的「嚴打」。據今年4月5日新華社北京電報道：2000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比1999年增長了5成。今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嚴打與整治的決定，「目標就是使中國當前『嚴峻的』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性好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指出：中央佈署這次嚴打，「是基於對整個社會治安形勢的準確判斷而及時作出的重大決策」。同時，專家指出：「中國正面臨1983年第一個犯罪高峰以來的第四個犯罪高峰。」

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刑事案件的劇增，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局兩年來打壓法輪功（和中功）而激起的學員前仆後繼的抗爭。而這又可從蕭揚向今年3月人大會議作的報告得到證明。他的報告的字數雖比去年減少，但卻費了比去年多兩倍的篇幅去攻擊法輪功，認定它「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干擾。」並且把法輪功份子列為刑事犯罪中的一個主要類別。檢察院系統也「以打擊法輪功、維持社會穩定和打擊經濟犯罪為重點」。這些都可反映出法輪功學員反抗的激烈，正是中共懼怕法輪功等勢力壯大威脅其統治而加以鎮壓所造成的惡果。

政策錯誤造成失業和貧困大增

其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導致工人下崗失業人數劇增，社會矛盾加劇，從而激發工人抗爭、社會不安。

據經貿委主任李榮融今年3月人大會議期間在記者會上透露：過去3年國企改革導致了2100萬名工人下崗，至今仍有7百萬人未找到工作。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表示：未來5年，中國新增就業人口料達5200萬人，除了能提供職位之外，將有1千多萬人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將從去年的3.1%上升到5%；農村還將有4千萬人轉移到鄉鎮企業或城鎮工作。

但這些官方數字並未反映出全部真實情況。今年1月18日《南方周末·新經濟》刊出其駐京記者馬克的《2000：分水嶺邊的中國經濟》一文指出：「城鎮登記失業率幾年來一直停留在3.1%這個數字上，但是如果加上下崗職工，失業率就數倍於此。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的估算，1997年的真實失業率是9.36%。2000年，登記失業人數基本未變，但下崗職工增加了400萬，因此真實失業應在10%以上。這個數字遠遠高於美國的3.9%、日本的4.7%，與高失業率歐盟國家相差無幾……。但歐盟是福利社會，

擁有高度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失業的問題要嚴重得多。據估計，中國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有三億之眾。」

中共南昌市委黨校的蔡水珍、羅賢讓、羅木水和總工會的金宏所合寫的《我國現階段職工隊伍基本狀況研究》也指出：

「下崗問題突出。下崗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成為廣大國有企業職工必須面對的直接影響其勞動經濟權益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下崗職工的家庭收入狀況看，下崗職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佔79.2%，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佔36.7%。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人生活已經陷入絕對貧困化。

而在解困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救濟面太窄，很多貧困職工得不到救濟。二是救濟金額太少，對一些赤貧家庭來說，救濟金如杯水車薪。三是有些工作只能緩解一時，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職工脫貧不起多大作用。……

由於下崗職工的大量存在，因此出現了城市貧困階層。據國家統計局對有關貧困戶的統計結果，目前戶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貧困家庭佔53.9%，離退休人員佔16.7%，在集體單位工作的佔16.5%，三項合計為86.9%。即因體制轉換因素造成的貧困職工已成為城鎮貧困人口的主體。而由於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他們中有人甚至連最基本的救濟金也領不到，下崗期間的生活貧困程度可想而知。」（引自《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9月號）

工人走上抗爭之路

在非常大量的工人瀕臨著下崗失業的打擊，尤其是本人和家庭跌入了赤貧化的苦境時，他們比對過去的生活較安定日子，自然會對現狀極為不滿，產生爭取合理的工作或下崗條件、應有的工作權、生存權的鬥爭，從而爆發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工爭議、糾紛、罷工、上街示威、靜坐等行動。

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官方新聞封鎖等原因，這些工人鬥爭行動，絕少能夠在內地報刊上讓人民看到。儘管如此，我們幾乎全可從「漏網」出來的海外傳媒報道中得知不少這類消息。以下就是近半年來所看到的部份事例：

2000年11月27日，深圳市寶安區日資的友利電器廠12000名員工大罷工，抗議資方迫使工人長期工作每日12小時，每小時平均工資不到2元人民幣，每月只有一天休息。在罷工前，工人曾要求建立工會、

增加工資、改善工人膳食和住宿條件等，但被廠方拒絕；大罷工後得到部份接受，工人才復工。在此之前幾個月，該廠也曾發生局部罷工。

同月28日，安徽滁州市國營紡織廠因被私企收購，欠薪及裁員迫使千多名工人在京滬鐵路上臥軌抗議，火車中斷8小時，工人後被公安拖離路軌。

同月底，江蘇省鹽城阜寧絲綢廠原有2千工人，因有逾半工人被令下崗，多數工人被欠工資半年以上，多次追討無效，該廠300工人聯署信要求成立獨立工會以爭取權益，其中一名領袖曹茂兵遭當局逮捕，且被關進精神病院，強迫服藥，他進行絕食抗議，引起「中國勞工觀察」這個組織代表絲綢廠工人向北京發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馬上停止非法迫害及釋放他，使工人行使組織工會權利。

12月21日，興資礦務局屬下3個實施關閉破產的煤礦之一的唐洞煤礦，因關閉遣散條件未獲解決，聚集的數千名礦工及其家屬發生騷動，圍毆該礦多名重要負責人及礦區工會主席，且把局黨委書記作為人質，折磨了他8小時，增援的公安警車被推翻和砸碎玻璃，200多名武警被迫停在1公里外。

2000年全國的勞工糾紛，據中國勞動部統計有12萬宗，是8年前的14倍。（去年12月18日《東方日報》報道）

2001年2月2日，工運人士李旺陽在湖南邵陽市大祥醫院開始絕食，要求中國政府醫治他被長期監禁造成的心肺疾病等。

3月6日，上海市正泰橡膠公司千多名工人因不滿公司強迫中年工人下崗，走上街頭示威。

3月26日，貴州省貴陽市冶金廠1500名被迫下崗而退休的工人，因廠方拖欠一年的工資和退休金，將市內公路堵塞。同日，河南省新野縣500名化肥廠職工，在縣委門前示威，抗議工資被剋扣近一年。

4月23日，數十名來自吉林省和遼寧省的下崗工人，不滿當地官員的腐敗和官商勾結，令他們的應得土地賠償大減，集體到北京中紀委門外遞交請願信並靜坐示威，要求中紀委派人去調查處理。

3月13日早上，5千名甘肅蘭州市出租車司機，因不滿當局的不合理高收費，將省政府包圍示威，7千名司機已於日前開始罷駛。當局出動300名公安和武警驅趕毆打示威者，至少有20名被打傷，10人被捕。

政協代表王德明（音譯）表示，全國市級以上的工人、農民示威次數，每年正以37%的速度上升。（3月14日《蘋果日報》）

農村人民多方反抗

在農村，由於農民被壓在頭上的稅、費、攤派、集資等負擔非常重，而農產品價格又連年大跌，農民收入不敷支出，造成了今天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的信的總結評語）。無數農民以棄耕拋荒來抗議，以離鄉到城鎮工作來謀生，或以不斷上訪請願要上級領導減輕稅費重負，有些地方的農民多次集體開動拖拉機到縣城堵塞交通（例如安徽懷遠縣淝河鄉的村民集體開到合肥市）；更有許多鄉村拒絕繳交稅費，進行激烈的抗爭，這種抗爭消息時有所聞。舉最近的事例來看：今年4月15日，江西省余江縣雲塘村千多名村民因稅費負擔過重，幾年來都拒絕交稅，與開入村的近百名公安及武警對抗，警方開槍打死2村民，傷18人；在這之前一天，當局以組織黑社會集團罪名拘捕了該村幹部蘇國勝，次日晨再衝入拘捕村民，因而激起全村居民抵抗。

關於黨政幹部的橫行霸道、無法無天、欺壓人民、而時常激起民憤、進行鬥爭的事例，可從以下的最新一則來證明：4月24日，廣東湛江市上千名市民衝擊該市一法院，因該法院要對一名被公安汽車撞成殘廢的老婦及其與公安理論而被公安打成殘廢的兒子進行審訊，實行「惡人先告狀」，反控他們以「妨礙公務」刑事罪。法院最後被迫中止審訊。

中共自食惡果

從以上很不完全的工人農民群眾抗爭事例可知，由於中共的各種政策措施錯誤、官僚主義及其特權橫行、貪污腐化等等，造成社會分化擴大、貧富懸殊嚴重，廣大工人、農民及城鄉民眾生活日益困苦，民間怨憤日益深重，不得不起而抗爭。統治者與被統治人民之間這個主要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當局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和人民抗爭日益加劇，治理及控制能力日益薄弱，發展下去，最後將有可能重蹈蘇聯東歐變天和米洛舍維奇下台的覆轍。

不久前，《中國「六四」真相》一書得以出版，在全世界公開發行，是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發展，它揭露出當年鎮壓學運、六四屠殺的具體內幕真相，指證出應對當年罪行特別負責的中共高層人物，使他們更加無法逃避歷史的審判，這本書也為將來平反六四起著促進的作用。

2001年5月4日

(轉載) 致江澤民促即釋放三位學者的公開信

鄭宇碩等375名國際學者聯署

江澤民閣下：

我們是參與中國研究的國際學術工作者。我們聯署簽這份公開信，希望向你表達我們對三位研究中國的學者，被中國當局扣留的關注。

任職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的李少民教授，在二月二十五日進入深圳時被捕，至今仍未公佈他被捕的原因，和他被關在哪裡。李教授已經入籍美國六年，著作繁多，主要研究私有化中的中國經濟、廣告在中國的影響與運用。李少民在一九八八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他也曾在哈佛大學出任博士後研究員。他與多家有意進入中國做生意的主要西方企業緊密合作，過去，他經常穿梭中港兩地。

我們也深切關注被拘捕，原居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高瞻教授。她在二月十一日被捕，當局指她為不具名的外國情報機構，從事「間諜」活動。雖然當局聲稱，她已經招認有關控罪，不過當局至今仍未有拿出證據來。她的丈夫薛東華也曾在當局沒有提出控罪之下遭拘留，及後獲得釋放。他極力否認對高瞻的指控。高瞻夫婦的五歲大美籍兒子也遭拘留二十六天，期間他與父母分隔；當局也沒有知會美國，違反了中美諒解協議。

高瞻主要研究中國留學生，特別是女性，在出國留學數年之後的情況。她被單獨囚禁多時，不被允許接洽任何協助。

最後，我們非常關注徐澤榮博士的安全。他在去年十月遭中國國家安全人員拘捕。徐澤榮於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從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出版工作，其後出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和中山大學連繫教授。我們至今不知道徐博士是否遭到檢控，也不知他面對什麼控罪。據悉，徐澤榮不能跟家人以至律師見面。

這三名學者全被長期隔離拘禁，當局卻藉詞他們只是被「監視居住」，這完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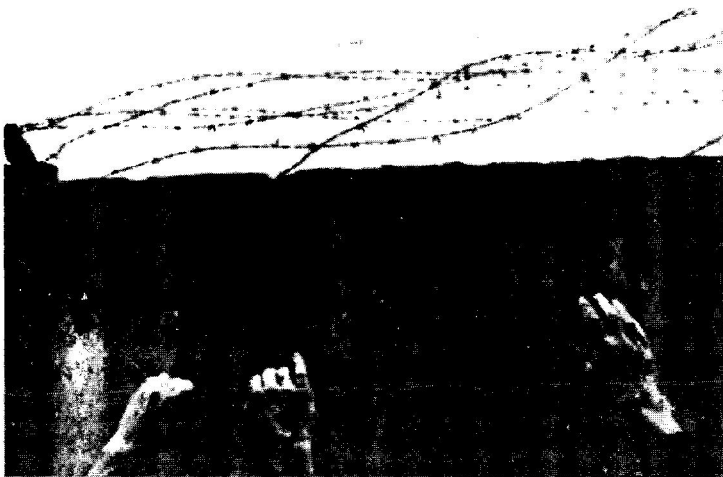
中國在一九九八年十月簽署《公民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顯示承擔為人民保護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和拘禁」，並保證所有「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七條訂明，國家保護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中國已確認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十五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進行科學研究和創造性活動所不可缺少的自由」。

高瞻、李少民、徐澤榮的被捕，違反了上述的基本人權。事件也令華裔，以至外籍學者，由於擔心自己將遭受同樣的對待，而妨礙他們在中國國內從事有關中國的研究。

學術關係一向是中國與外界改良關係的最前線。數以萬計的學者、為中國現代化貢獻良多，他們也協助中國和外國的相互了解。因此，出現學術交流和研究條件的倒退，實在令人驚訝和恐慌。

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交換意見及想法的自由，對於一個社會的健康，尤其是一個將要投入全球經濟的國家十分關鍵。我們恭敬的促請閣下的政府，立刻釋放三位學者，或從速讓他們在一個法律程序具有國際水平的法庭內（包括能夠自由選委任辯護律師、得以定時會見其領事代表），有真正機會就正式起訴申辯，以表現閣下的政府對保護及鼓勵中國學術自由的承擔、維護學術交流從而達至國際互諒互信。



(轉載) 抗議中國國安部隨意抓人

于浩成等13人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李少民，曾多次到中國大陸講學。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返大陸內地突然失蹤，最近知道是被中國國安部在深圳海關秘密扣留，至今未釋放。此事在香港、美國媒體上曝光後，引起強烈震動。

李少民先生，是一位中外著名學者，八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之後赴美深造，九三年榮任聯合國的中國顧問，就人口資料提供分析意見。

他在香港城市大學期間，還經常應邀去中國多間大學講學。尤其是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科技部聯合邀請他，到北京為在京的有關高級幹部專門講授網絡經濟問題，深獲重視。當晚中央電視台特向全國廣播介紹，廣泛反映極為良好。

對這樣一位著名學者，他在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和推廣上，如此熱心盡力，竟遭中國大陸當局拘捕，殊令人驚詫，不解之至！

現在，李少民先生被中國當局扣留一事，至少使人們注意並質疑三件事實和問題：

一、中國對待凡是吸引西方現代社會文明科學思想卓有成效的中國學者，總是初則多方利用，繼則百般懷疑，這又證明他們把學術自由和思想民主視為政治罪嫌，已是習慣惰性。此次李少民先生在深圳入境時被國安部人員逮捕，顯然是有預謀之誘捕行動，用心叵測。因此，這不是現代學者李少民一個人的事，從根本上講，還是中共對學術自由、思想民主的壓制和摧殘。凡我學術界人士均感身受之憂、不得不起而抗議之、反對之。

二、中國把「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寫進憲法，但中國國安部門，違反司法程序，隨意秘密抓人，使受害者家屬不知自己親人是「失蹤」，還是受其他不測。這是中國國安部門無視中國憲法、踐踏人權的行為，必須糾正！

三、中國政府一面號召中國留學生回國為自己祖國服務。中國國安部隨意抓人的做法，明顯與中國留學生政策背道而馳，使留學生、海外學者感到大陸內

是一個沒有人身安全保障、隨意抓人的地方，雖有回國服務之心，又怎敢以身試不法之禍！

我們對中國國安系統隨意抓人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希望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李少民副教授返回香港，繼續他的教學活動。

李少民先生是美國公民，我們也強烈要求美國政府積極關心此事，使李少民立即獲得釋放。

發起抗議人：

于浩成、戈揚、司馬璐、伍凡、阮若瑛、阮銘、林保華、金堯如、陳奎德、楊月清、高臬、嚴家祺、蘇紹智。



李少民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美國公民，二月二十五日於深圳被國安部拘捕。

從撞機事件看中美關係

軍行

美國偵察機4月1日在中國海南島空域附近被中國兩架戰鬥機攔截，並發生相撞，一架中國戰機墮海，機師王偉失蹤殉職，美機也有損壞而被迫降落海南島，機組24名人員同遭扣留。在中方堅持之下，美國為要機員獲釋，便致函中方對失蹤飛行員及飛機表達誠摯的遺憾，以及「就美機未經口頭許可而進入中國領空和降落中方機場向中方表示非常抱歉」（但信中仍無作出認錯式的道歉），中國政府才釋放了全部機員。這表明美國軍機長期以來在中國沿海領空進行間諜偵察、蒐集情報的任務，以世界憲兵頭子自居，是霸權主義的表現。因而造成這次中國機毀人亡的悲劇，這種霸道行為是必須予以譴責，在中國沿海空域的偵察飛行是必須停止的！

但在機員返美後，美總統布殊的態度隨即強硬起來，指責中國扣留機員11天，堅稱美機在國際空域執行任務，沒有做錯，絕非禍首，還會要求美國代表嚴厲質問中方，為何挑戰「合法飛行」的美機？美國務卿鮑威爾也聲稱，美方沒做錯事，因此不可能會向中方道歉，「道歉意味要對撞機事件產生的一切後果負責。」

布殊在上台之前，已不認為中美是友好戰略夥伴關係，而是重要的競爭對手，視中國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力量。他上台後認同其國防部長提出的建議，放棄二戰後重歐輕亞的戰略部署，反映出美國要把頭號敵人由俄國改為中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政策；從而更加打台灣牌，幫助台灣加強軍力，在撞機事件後不久，他就批准向台灣出售可能達50億美元的先進武器，包括驅逐艦、潛艇和戰機等。他甚至一度對傳媒表示，一旦台灣受到大陸攻擊，美國有義務保衛台灣，將竭盡所能幫助台灣進行自衛。雖然他稍後聲稱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改變，出兵協防台灣只是其中一個選擇，也希望台灣不會尋求獨立，而信守「一個中國」的原則，這些較溫和的多少帶外交式的說法，也難抹去他先前那種強硬態度的真情流露。

布殊是非常右傾保守的美國資產階級代表，自視

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要在世界各地保護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此，他領導下的政府單方面退出改善地球溫室效應的《京都協定》，以免這項協定損害美國有關工業的利益；此舉連歐盟等國也表示不滿。美軍核潛艇在夏威夷撞沉日本漁船，造成9名日人死亡；它的核潛艇又未經許可而駛入日本港口，等等，都激起日本民眾的憤怒。它以「間諜」理由驅逐51名俄使館官員，表現他對俄國的強硬姿態，招致俄國同樣的報復。布殊上台後顯現出對北韓存有敵意，使朝鮮半島局勢重趨緊張，引起南韓人民的反美情緒愈來愈高漲，2千名民間組織成員示威，抗議美國發展全國導彈防衛系統。它所推行的經濟全球化，更是到處激起各國民眾的抗議鬥爭……。所有這些，都顯示布殊所加強推行的霸權主義普遍遭遇各國人民的反對。他的強硬外交政策，也將增加與各國間的摩擦不和，加劇世界的軍備競賽。

中國日益實行市場經濟而走向資本主義化，是美國所樂於見到並設法推動中國全面加以完成的。中美兩國在經濟、貿易上互有重大的利益關係，美國資產階級和中美兩國當權者都不願兩國關係太過惡化，以致損害自己從對方所能得到的經濟利益。這是撞機事件不致繼續鬧大、北京不願利用民眾情緒激烈反美的原因。但，起碼在這幾年間，中美關係將不會是融洽友好的。這些發展也說明，幾年前北京領導人宣稱與美國建立友好戰略夥伴關係，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關係只能建立在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

台灣當局利用布殊的強硬政策，花費非常巨額的資金，從美國買入大量武器，這並不能如它所望的有效保衛台灣，反而會激起北京的負面反應，加速兩岸雙方的軍備競賽，加劇兩岸的緊張關係。這又一次表明，要達到兩岸的最終統一，必須兩岸都實行徹底的民主改革，以便在全面民主的基礎上實現兩岸人民自願的和平統一。

2001年4月28日

中國發展路途多阻

邁登

踏入21世紀，中國佔了一個特殊的位置。美國華府中人相信，在未來的數十年，中國將是美國在國際層面的競爭對手。而針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景，人們更普遍的是猜度：這將會為中國在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演變，帶來什麼影響。本文著眼在中國去年的發展，及由此而反映的發展趨勢。

去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如人們所料，是放緩在一個位數字：1999年是7%，2000年約是8%。2001年標誌著中國踏入第10個五年計劃的開始。按李鵬估計，未來平均每年會有7%的增長。而在未來的5年裡，將是把主力放在發展落後的西部省份。中國展望，到2010年時將把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不過，這樣的展望能否達到，人們除了需要給展望的增長率打折扣，扣去2-3%之外，也需視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對中國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美國成為中國最大輸入國

在資本主義經濟變化對中國會造成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們只需記著一點便足夠：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產品最大的輸入國。所以，美國經濟如果放緩，或甚至是衰退，將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償還貸款的能力，會有多大的衝擊，便大成問題。再者，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她目前有的各種保護稅制，便將會大幅削減；這方面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什麼影響，也是疑慮重重。例如，在汽車製造業的126所企業，將來只有40所企業能夠生存。在食品業方面，現存的1萬間公司中，只有半數能夠生存。至於最困難的經濟部門，當數農業。據中國在這方面的專家估計：「中國無法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公司競爭，農業部門的衰落，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很有可能會在農村看到觸目的演變。

最近，外資公司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將對中國政府的決策發生多麼大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

外資深入中國的狀況持續，而且採取了多種形

式。在這方面，來自港、台、日的資本最大宗。

在去年裡，財雄勢大的愛克遜無比石油公司（Exxon Mobil）、BP Amoco和荷蘭蠅殼石油公司，對中國表現了莫大的興趣。上述公司在過去已經購入了中國石油公司價值18億美元的股份。另一方面，中國石油公司亦有價值38億美元的股票在國際市場流通。同樣投入了國際市場去的，還有電子通訊業的公司的股票。在2000年前6個月，來自中國的公司有價值90億美元的股票值在國際市場流通。再者，我們可以預期，外資也會插手到中國對虧損的國有企業的重整活動。

外資銀行久已乎在中國運作，只是限制尤多而已。在今日大都會的上海，外資銀行的角色日顯重要。這些銀行可以提供信貸、接受存款，以及在合營公司的名義下參與外匯市場。外資銀行已經佔有向商業信貸的5成市場。最近，中國把另一個重要的項目向外資開放：保險業。例如，在去年10月，繼歐盟負責人訪華之後，中國金融管理局主席宣佈，將安排接受歐盟7間公司投進中國的保險業。這項宣佈，是在中國加入「世貿」一事未有定論前作出的。今後，集團甚至可以參與設立退休基金。中國保險業的要員表示，希望外資參與保險業的比率，高達33%。

中國股票市場再擴展

在中國，私營銀行也開始運作，而且發展迅速。而在股票市場方面，也在進行改革。中國現有在上海和深圳兩間交易所。兩間交易所一向的運作相同，只是規模有別。今後，中國發行的A、B股票（前者針對國內投資者，後者容許外國人購買）之間的分別將會取消。上海的交易所今後將處理各種交易，深圳將專門處理紐約華爾街納斯達克指數的買賣。

據《紐約時報》所述，中國現有5千萬人參與股票買賣。這個數字，除美國之外，是全球之冠。此外，中國現在的個人存款高達8億美元，所以，據該篇文章評論，「中國的市場有著使私營部門勃興的財

政潛力」。而據英國《經濟學人》去年底報道，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去年全球表現最好的股票市場。

上述狀況表明，外資在中國的活動已經不是邊緣性的份量，而且中國也日益增加地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倘若我們相信由不同渠道提供的資料——例如「國際金融公司」撰寫的報告，則在1998年時，中國的全國生產總值中，私營部門佔了33%，國營部門是37%。

在非國營的集體部門方面，情況已經不再純粹單一，而是有了相當大比例的私人企業。這個部門是目前中國最具活力的，年增長率到25%，吸納了部份從公營部門裁減的人員。

中國現在的變化，是具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這個特點已經超過了一個官僚化的過渡社會的形態。全球股市那種瘋狂上揚和下挫，我們在近期的中國也能夠看到規模較小的縮影了。

從1970年末發生的變動，不可能沒有重大的社會效應。農村方面的狀況不論（農村的生活水準持續下跌；在1998年終，農村每人年入是2162人民幣，城市是5425人民幣）。直至最近，國家的結構重整，給城市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城市的失業率達到史無前例的新高，按法國《世界報》的數字，是15-20%。例如，在上海的紡織業，業內人數從1980年代的50萬人，下降至現在的16萬人。而未來的展望也不樂觀：在未來5年，國營企業將會把5分1人員裁減。

不過，最觸目的社會變化，就是十足十的資產階級的成形。銀行存款的狀況看來印證了這種演變：80%的存款由20%的存款者所有。而更準確地說，甚至連中國的報章，也談到資產階級在不同經濟部門的活動。去年11月的《財富雜誌》刊出了最富有者的名單，其中名列首位的是「紅色資本家」榮毅仁這個老資本家，估計有財產19億美元；次位是較年輕的劉永好、永行兄弟，估計有家財10億美元。

資產階級層份在3個層面形成：舊有資本家或其後代重新冒出頭；透過投機倒把而累積財富的個人；從官僚層份演變為顯赫的資本家，合共三類。我們顯然沒有數字來對上述三類人的比重作出評估，不過，官僚出身者由於有較高入息和可資利用的國家職位，會有著明顯的優勢，這至少在起步時是這樣。

新中產階級興起

在社會層面的變化，還有一點不容忽略，那就是犯罪活動的復興。這些犯罪活動多少皆有著組織性，就在資本主義累積的過程中如影隨形。昔日的犯罪集團三合會也同樣的捲土重來。去年的中國，便有高官因涉嫌與三合會有關而辭職丟官。另一方面，官方的言論也例行的譴責在政府各個層面司空見慣的貪污活動。

最後，經濟的增長，尤其在私人經濟範疇的現代經濟部門的增長，導至一個可以稱之為「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這個新現象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前輩正確地指出：「傳統的中產階級正在沒落，由新生代取而代之。」又說：新興的中產階級「是由受過更高教育、受僱於外資公司和新興商業領域的人所組成，他們顯現出十足的消費欲。」目前大致有兩類僱員：「第一類人在國家或集體企業工作，他們構成了城市僱員的多數。第二類人是被計劃經濟的現行結構摒除出來而投入到市場競爭如自由職業、各種小生意、中小型企業的主腦、新近成立的企業經理或僱員，及外資企業的僱員。」這第二類人享有「高出許多」的入息。構成「新生的城市中產階級的大部份」，主要是外資企業和新公司的僱員。

總理朱鎔基去年10月向中共中央作出報告，在《關於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作總結時說：「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科學技術還比較落後……就業壓力加大和部份地區生態環境惡化；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貪污腐化、奢侈浪費現象還比較嚴重……」

上述要解決的目標，基本上在過去數年間反覆說述過許多次。再一次的重申，實際上就是默認了，即使經濟在過去續有增長，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由中國加入「世貿」而使外資和私人經濟在中國經濟的比重增加，現有的問題是可以更加的惡化。

中國的領導人並非不知道由他們釋放出來的動力，正在挑起社會更多的緊張和動盪，而且這種挑釁在將來仍然會繼續。在去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證實了他們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例如在去年2月，發生有2萬名遼寧礦工上街和警察發生衝突的事件。在其他農村地區，遇到無償解僱的工人，也有尖銳的衝突事故

發生。又如在去年11月，江蘇省的1千名紡織工人，發起了運動，反對領導人貪污和工會無能。

總體的狀況是，從1992年——1999年，勞工衝突的事態上升了14倍，達到12萬宗。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當前的領導集團有什麼對策呢？

中國行革命階段論

根據中國領導人素來的聲稱，國家要發展，以至現代化先決條件，便是加速經濟的激烈改革，以及加強融入世界市場的步伐。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中國與前蘇聯的領導人有多少的差異，中國的領導人是與戈爾巴喬夫的改良派站在同一平面的，而且中國把改革推得更遠。不過，根據中國領導人的說法，中國和蘇聯的分別，乃在於蘇聯的目的是要逐步侵蝕既有的政治制度的框架，而中國卻是保留這個框架，而且將來也要保留，以看守黨的絕對霸權，及黨國合一的地位。

人們要是把握某些公式的潛在邏輯，注意到為這個落後國家的轉化而描劃的遙遠圖象，那麼，分析到最後，作出以下這個結論便不會是武斷的了：中國現行的領導集團認為，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之前，要經歷完整一段資本主義式的發展時期。在嚴格的意義上，這就無疑於把理論神秘化而同時又自我神祕化。人們甚至可以附加一句：在經過100年後，中國把當年俄國孟什維克的老調重彈。這個老調子，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作出鬥爭反對。

問題是，這項計劃——不管人們對它怎樣界定或評價——是不是能夠有效地實現？

我們已經從經濟的角度來提出實現這項計劃的主要困難：中國之日益融入世界市場——正式加入「世貿」之後會更甚——將會在全國的層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這是通過經濟週期性的尖銳起伏及政府的決策，使政府在五年計劃的框架內所作的選取受到制約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一個能夠自主地作國際聯繫、更具活力的資產階級層的冒起，也不會沒有後果。

再者，若以為通過維持現行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便能抗衡新生的需要和壓力，那不啻是痴人說夢。事實上，今天高踞黨政軍機關的人，他們與1930年代、40年代的革命人物，以至1950年代和60年代的

幹部和戰士，俱很少有共同之處。還有，現行的在位者和他們的接班人，皆勢無可免的會受到未來日益尖銳的社會演變的模塑。至於新的情勢，將文化和價值危機來突顯。事實上，法輪功的發展，已經使這個危機的訊號呈露無誤。在面對著進入「世貿」和怎樣處理社會當前的各種弊病、怎樣淡化威權政體等問題，統治小圈子是會有著分歧的。而且，我們更有理由假設，日漸形成的社會分裂，將會對政治結構各個層面的人日益產生衝擊。總之，對於這一連串問題，實在難以給出窮盡的答案。

不會有和平的資本主義復辟

不過，要是「新孟什維克」的計劃在我們看起來是痴人說夢，那麼，假設在一個保留著後資本主義的官僚化的過渡社會的框架之內，有可能會完成資本主義的復辟，這也同樣是不可思議。這樣的一種假設，也是那些日益融入到私人資本的增長或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重要的經濟領域有聯繫的官僚的意欲。

換言之，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的矛盾衝突，最後必然會導致社會的興起和爆發。在新一個世紀的最初數十年裡，中國將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不會有順暢的、和平的演變。

（史丹節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



越南的勞務輸出醜聞

黃申輯譯

按照新「勞務輸出」項目的規定，越南政府將每年向海外輸送10萬民工。1996年上半年，大約已輸出2萬。這勞務輸出數量上的急劇增長（1995年僅為5千），目的在於緩解不斷增長的失業危機。這個國家的「以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市場經濟」卻有8百萬至1千萬失業工人。

政府官員們把越南勞工作為苦役或馴服的工具出賣給東亞「四小龍國家或地區」、日本及中東。據稱勞工們的權益會受到保護，但他們還是蒙受了肉體上的摧殘，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1993年，在胡志明市「勞務及專家輸出服務公司（LSES）」，就2千名勞工與南朝鮮公司簽訂了兩項合同。派往南朝鮮的工人們，被分配在服裝廠、塑料廠和皮革廠工作。LSES所簽署的合同，禁止工人罷工或離開工作崗位，這是徹頭徹尾的不顧這樣的事實，即LSES是胡志明市勞動部所屬的國有公司，負責保護工人的福利——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根據一家報紙上的報告所說，以前被LSES派往南朝鮮的勞工工資，其20%要付給越南政府，而另外4%則因銀行匯款而被扣除。這樣以來按合同所規定的，每人每月100美元，僅剩下76美元。儘管所簽合同為每天8小時工作時，但還是增加到12小時仍不算額外加班。當工人們找經理要求支付額外加班費及改善工作條件時，他們就遭到毒打並被剋扣工資。其中有個公司叫「普林斯國際公司」（Prince International），還每月付980美元給一來自LSES的越南勞工官員來「對付」越南工人。

勞務輸出新的目標

儘管派往南朝鮮的勞工有這樣的經歷，但「勞務輸出」仍在繼續。1993年，總共已有4500名參加勞工輸送到南朝鮮。1994年，一家Vinaconex公司，即建設部之下的一家國有貿易公司，同南朝鮮的「東亞建設公司」簽定了一項合同，把2千名勞工派往利比亞。而1995年，有5千多民工輸往南朝鮮。

政府還在台灣及日本為越南勞務的擴展尋求市場，1993年5月越南政府說服台灣當局允許僱傭越南民工作為緩解台灣勞力短缺的一種措施。兩個月後，

簽訂了一份「勞務進口協議」，到了那年下半年，第一批1千名工人被派往台灣建築業和紡織公司工作。此後，又與台灣政府簽了若干合同，這些合同都是以使用越南民工來取代相當「昂貴的」及「態度強硬的」菲律賓工人。

現在，約有1萬5千名越南勞工在東亞及中東，但這並不包括成千上萬在前蘇聯和東歐的越南民工。至今在前蘇聯，9萬越南勞工中僅有5千人有固定的職業。工資低（平均每月20-30美元）迫使他們放棄原來的工作而去尋找其他行業。儘管口頭上也談培訓的事，但40%派往海外的勞工立即受僱於勞動強度大的輕工業，另外26%則受僱於重工業及建築部門。據1994年一份官方報告說：「一些人對培訓機會很少有所抱怨，11%的工人是由於違反勞動紀律而被迫回國，有些工人則對工資低、生活及工作條件差而不滿。」

在前蘇聯和東歐境內已有十年以上的越南勞工，約有3萬到5萬人是在1982年所簽訂的特定經濟合作協定的條件下去的。一年以後，越南政府停止參與「國際勞工組織」，這是因為受到了其他成員國的指控，指責越南政府從扣發越南勞工的工資來償還欠蘇聯的大量外債。兩年之後，即1985年5月，越南政府正式退出了「國際勞工組織」。

儘管如此，類似的合同仍繼續簽署。如1984年同阿根廷，1986年與伊拉克，1988年與利比亞。在未來的十年中，有22萬越南勞動者作為外籍勞工被送往海外。到1992年底，已向海外輸送了32萬人。他們中的一半人是在1987-1989年出國的，而這期間剛好是經濟自由化之後和「對外開放」政策的開始。

1989年，即越南退出「國際勞工組織」僅4年以後，「勞動、病殘醫療及社會事務部」屬下的主任Tran Luc承認道，通過勞務輸出，「國家可贏得外匯還債」，而「越南工人階級有這個義務，把他們的外匯收入的10%-40%貢獻給越南政府，為祖國的建設和保衛國防而貢獻力量」。

勞務輸出是筆大買賣

約有40家國有及私營單位取得營業執照從事

「勞務輸出」，這包括國家級及省級的政府部門及各部所經營的商業單位。

自從越南決策者提出，勞務輸出項目「對解決失業問題是一有效的長期的辦法」之後，無論是私營的還是國營的機構，都可以從政府部門的「國家就業基金會」處得到資金來支持其商業活動。其中一機構稱作「越南工會勞務中心」（LACETU），是由「越南總工會」（VGCL）利用1993年國家基金所建的。這一機構的運作也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半私有化企業，並

非作為工人的組織。

根據廣告小冊子所說，「越南工會勞務中心」是：「準備為各種經濟部門及國外資本家企業或公司所需的生產機構提供技術人才。」

隨著不斷剋扣工人的工資，目的性已起變化，工人的工資便持續不斷地受到剋扣，勞工一旦「出口」海外，他們的權利已被剝奪。而唯一真正起變化的是勞務輸出不再用於減少國債，而已成為全國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門有利可圖的買賣了。

哈薩克斯坦左派和工運近況

肖軍輯譯

2000年6月7-8日，在俄國共產主義工人黨烏拉爾地區黨組織支持下，在南俄城市車里雅賓斯克召開了哈薩克斯坦左翼工人組織「團結」第三次大會。大會上共有來自十三個地區的代表參加。三大召開本身就有不小意義。上一屆大會是4年前召開的。這四年來，按「團結」領導層的看法，組織由於哈當局有系統地迫害，而處於半瓦解狀態，大部份地方組織各自為戰，缺少協調。「團結」主席伊斯瑪伊洛夫在這期間下獄一年；副主席汶科夫被迫流亡俄國；「團結」的合法地位被司法部取消；庫爾曼諾夫、麥德維傑夫、瑞立巴、讓娜芭耶娃等一批主要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這次開大會也不得不轉到國外。

「團結」三大指出，哈國早已處於半獨裁狀態。受到打壓的不僅有左派，也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最近發生的《從週一開始》報查封案就是一個例子。

「從」報是非政治性的大眾消閒報紙，只因不肯為政府過於露骨的捧場，就遭到「嚴打」的下場。幾個主要編輯被迫向俄國申請政治避難，而編輯部的財產被沒收充公。儘管政治迫害的浪頭還在高漲之中，「團結」保留了自己在哈工人階級中有鬥爭願望的那一部份人裡的主導地位。2000年以來主要的街頭抗議活動（反對退休金制度惡化，反對土地私有化）均由「團結」指揮下進行的。

在三大上通過了一系列決議。關於工會的決議指出：近十年來哈左派運動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就是片面強調「罷工委員會」的作用，忽視了工會的建設。

實踐證明所有的「罷委會」和「工人委員會」僅是鬥爭高潮時的產物，在群眾熱情下降後（而這是不可避免的），類似的機構通常就垮台了。所以需要一個穩定的、為工人日常利益作鬥爭的組織，那就是工會。另一個更嚴重的錯誤，是由哈薩克共產黨上層搞起來的許多空頭機構，什麼「工人蘇維埃」。這些團體與企業毫無聯繫，終日清談，發發決議，而他們的成員通常是退休或臨近退休的黨員。類似的自我欺騙只會阻撓左派在工人中擴大影響。決議認為，在左派活動家和工人黨員裡有兩種相反的傾向。一部份人認為官方的「總工會」是「反動政權的黃色走狗」而拒之於千里之外，另一些人則醉心於無原則的上層「統戰」工作，試圖同工會頭頭建立各樣臨時性競選同盟。這兩種傾向起源於一個根子：無心作艱苦的工會工作。結果是政府和僱主們得以順利實現他們的反勞工法則出台計劃，而左派無法有力回擊。決議認為需要既在官方的總工會，也要在獨立工會中開展積極的活動，特別是在車間委員會一級組織上。此外，需要填補工運空白，在街頭商販、司機、服務業人員和失業者中間建立工會。在有條件的企業中積極改選工會負責人。

「團結」的大部份成員是哈共黨員，在關於「團結」和哈共之間關係的決議中，大會指出，儘管哈社會緊張程度持續增長，參加「直接行動」的抗議群眾人數越來越多，哈薩克共產黨的表現倒越來越差勁，越來越打不起精神來了。在1991年12月成立的哈共

本來擁有許多工人幹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大部份是工人。然而十年來黨官僚運用一系列陰謀詭計逐步排斥了工人幹部。當謝·阿布捷爾京成為黨總書記後，中央的路線更向社會民主主義迅速傾斜。黨綱、黨章陸續在「民社」的思想指導下被修改。黨中央對工人運動口頭支持，實則袖手旁觀，在某些情況下更公開搗亂。借口「不能破壞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哈共中央指令各級黨委不要在工廠企業中開展政治活動（哈國法律禁止政治團體在企業單位從事活動——譯者註）。對堅持活動的工人黨員不僅不支持，反而主動拉開距離。最近一個時期的抗議活動與哈共中央完全脫鉤，並有落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政客手中的危險。而部份哈共中央負責人索性公開聲明與「鬧事的無賴們」無關，以免與當局搞僵關係。對官方的總工會則客氣、笑臉逢迎，指望著這些官場手腕會有助於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利用廣大群眾中

普遍存在的懷舊心理，哈共歷年都在議會選舉中高票入選，然而對當局一貫的反勞工立場向來表現軟弱，最近乾脆一聲不吭。在這同時，最近一次中央全會上增補了幾個以詐騙起家、臭名遠揚的大商人進入中央委員會！關於黨名會改為「社會黨」的小道消息也出現了。

本屆大會召開前夕，哈共中央解散了最有戰鬥性，也在工運中最有實力的卡拉甘達州黨組織。中央大員索洛京下車伊始，發號施令，州委書記、工人領袖瑞立巴被宣佈為「反黨」並遭開除。大部份黨組織成員已表態支持瑞立巴，反對中央的解散決定。

「團結」第三次大會聲明支持瑞立巴的原則立場，反對哈共中央的決定。同時三大提醒廣大工人黨員和同情者對中央的機會主義立場提高警惕，堅決抵制。

21世紀匈牙利左派巡禮

安多爾

〔本文原刊在德國《新德國》報，作者安多爾是布達佩斯社會科學及公共行政大學的副教授，著有《匈牙利邁向歐盟之路：藍色的過渡》〕

從匈牙利左派的組織結構來看，只能夠從「匈牙利社會黨」來開始談。這並非由於匈社會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屬於社會主義，也非由於它在黨政治方面是唯一的一個左派組織，而只是因為它是一個大集燴：首先，它是唯一一個在競選基礎和組織能力方面有著堅實組織的左派團體；其次，乃由於許多其他左派的組織、綱領和出版方面，皆與匈社會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左派大阿哥：社會黨從共黨脫胎出來

「匈牙利社會黨」是在匈牙利老共黨「匈社會工人黨」在1989年10月最後一次大會上誕生。舊共黨當時有超過70萬黨員，然而加入社會黨的只有3萬人。社會黨成立後，脫離了舊日共產黨世界的聯繫，改而在1996年投進「社會主義國際」的陣營。不過，雖然匈社會黨一再強調與昔日決裂，但它繼承了

昔日共黨的許多資產，而新黨的大部份領袖和成員，都是新瓶舊酒，來自昔日的共黨。

在1990年代，除了社會黨外，其餘左派組織皆無法躋身到匈牙利國會。不過，就在1990年那時，有4個左派組織仍是旗鼓相當，而事實上，正是這樣而造成了右派上台，因為左派的票數由數個組織互相分薄了。

在1989年之前，舊共黨擁有大部份報章。而就在1989年，許多全國報章和地方日報陸續的成為上市報章，由公司擁有，或由大財主收購。匈社會黨的一些工會組織仍然出版本身的刊物，甚至發行新刊物，但俱不能取得全國重要性，只能在所屬的特定地區具有重要性。

匈社會黨在1998年之前仍然能夠出版月刊，之後便無限期停刊。所以，到了1990年代末，市場上只有兩份左派刊物流通。其中的一份是季刊Eszmelet，在1989年由產生自「另類左派協會」的小型團體的「新左派」代表所創辦，在當時是雙月刊。這支運動在1988年發軔時有300名成員，在1990

年代初期的左派政治圈裡，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在匈牙利，這是唯一一支宣揚用左翼另類批判的政治傾向，探討在失敗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體之外另找出路，並且主張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內實行工人所有制。

「另類左派協會」的領袖們是匈社會黨內的激進聯盟「左翼集團」的重要人物，而與黨有關的刊物基金經常都向Eszmelet提供支持。

另一份重要的左翼刊物是Ezredveg，這是一份由「工人黨」支持的文化及政治月刊。Ezredveg定期翻譯世界當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著作，並且為匈牙利優秀的社會主義文學和詩提供園地。

在匈牙利，在國家及索羅斯基金會贊助下有各種各類的自由派雜誌和保守派雜誌；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自由派雜誌裡，不時也刊載進步作家的文章。此外，有關環保問題的雜誌也紛紛出場，但這類刊物的政治取向卻不太明朗。隨著索羅斯基金撤出而右派對政府機關的影響力增強的形勢下，展望未來，進步報刊的地位將會更為弱勢。

1956年革命的神話長存

自1990年鐵幕垮台、匈牙利進行了首次大選的繼後10年裡，國家的政治景象無大變動。在國會方面，在共產黨倒台後的3次大選，一直都是同樣那6個黨當選，期間，只有在1998年發生小變動：小黨「基督教民主黨」潰倒，由極右的「匈牙利公義和生命黨」取代。而事實上，這個極右黨也不是首次登場，因為該黨領袖伊茨凡·佐爾卡是共黨倒台後首屆國會的執政黨「匈牙利民主論壇」的副總統。至於在國會外的黨派，死灰復燃的匈牙利共產黨擁有最強力量，它自1990年代初迄今都是在野黨派中最強大的一個黨。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範圍裡，圖象也是大同小異，無大變更。在1989年時，新興力量的政治論調和道德本錢是和達成一個制度性的變革和過渡相聯繫的，這個變革是把國家從中央計劃經濟的一黨專政，邁向一個市場經濟的民主多黨制。這個共同目標在1989年一旦確定下來，繼後的政治議程便是使匈牙利逐漸在市場民主政體下走向完善。對執政者的批評，就是他們未能恰當地完成這個制度性的變革。而執政者的回覆，則是只有在或此或彼的情勢下才能完成那樣的變革——也就是說，他們需要再當選來實行。

在匈牙利過渡期的政治思想裡，有關1956年「革命」發揮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在1989年發生的變動，是由修正1956年革命來開始的，因為執政至

1980年代末期的卡達爾就是在鎮壓1956年起義後才為政權獲得上台的認受性。不久之後，各種左派俱明白到，在共產黨下台之後，對1956年持負面態度的政治力量，是無法生存的。

在1990年代初期，右派政府企圖把國家從國家社會主義的狀態中推回到過去——而不是推向未來。政府的施政主要是企圖令社會和文化懷舊復興，以致令某些人把戰時那個半法西斯獨裁者霍爾蒂美化起來。

可是，甚至左派中人也同樣的面朝過去，而非未來。例如，說匈牙利當代的「工人黨」是懷舊的左派，乃不是誇大之詞，因為這個黨的主要訊息，就是匈牙利人在1950年代末年至1980年代末，即卡達爾治下的年代，活得遠比今天更好。黨最大型的集會（吸引全國數千人參加）就是7月初紀念卡達爾逝世的日子。

信奉市場民主政體

社會黨人時常都希望和舊共產黨劃清界線，所以他們也拿黨的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用作為劃清界線的工具。這個現代化的綱領認同市場民主政體及歐洲與大西洋一統化，從而使社會黨與匈牙利其他政治菁英的總趨勢沒有分別，都是把歐洲視為烏托邦，作為過渡邁向的目標。政客和社會科學家凡是談到什麼是好或會更好，都會把好的稱為歐洲的。可不過，他們所指的歐洲烏托邦，卻是用歐盟在奉行新大公司制、社會——基督教民主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前的歐洲為範本。匈牙利社會很少分析到冷戰結束在西方世界引發的變化，以及實施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而對歐洲社群的社會政治模式的損害。

社會黨在1998年大選落敗之後，匈牙利展開了走「第三條路」，或走「匈牙利式貝理雅之路」的大辯論。尤為諷刺的是，倘若要走上這條路子，那麼唯一合適的人選，倒是曾經在以倫敦為根據地的「歐洲重建及發展銀行」出任副總裁長達9年的前匈牙利總理內梅特。在當下，在社會黨裡，現任黨領袖科瓦奇與曾任前總理的內梅特和霍恩，及內梅特任內時期當部長的邁傑希，這4人正為逐鹿出任2002年大選中社會黨總理候選人的位置而明爭暗鬥。這4個人都是老黨時期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經濟學家出身。社會黨在1999年引入了比例代表制，以提拔年輕黨員及女性黨員有代表廁身黨的領導機關，但這個措施大概幫不了什麼忙，解決不了4人競逐總理候選人位置的鬥爭。美國政治市場顧問專家向社會黨提議，應該

側重關注婦女問題，以爭取在2002年能組成中間左派大選聯盟。只不過，在「四人幫」互相角逐而佔盡傳媒注意力的情勢下，黨的運動宣傳攻勢或許無補於事。

缺乏21世紀清晰視野

黨由於看到過去的實用主義的短處，而且也想把注意力抽離開人事鬥爭，所以在1998-2000年期間推出了一連串政策文件，包括有《社會民主黨憲章》，和黨在今後15年的政綱。策劃這些文件的是黨內右翼代表人物、老社會學家維坦伊。隨同這兩份主要文件面世的，還有林林種種小號文件。然而，上述所有文件俱無法創出一個清晰的另類道路，而沒有這一點，是無法吸引年輕一輩追隨左派的價值觀。而沒有新一代的加入，社會黨便無可期望在2002年取代右翼聯盟，因為後者由「年青民主陣線」及「匈牙利公民黨」組成的右派聯線，得以在1995年以後，藉著社會派——自由派執政時期增加大學學費而發展起來，在青少年間取得支持。社會黨為了爭取年青一輩，已經開始在電腦互聯網上組織宣傳運動，可是，黨就平等的學校制度問題總是欠缺一個清晰的視野。

在21世紀的政治裡，除了對青少年的取態和展望，就是生態問題，需要一整套進步的左派綱領。在匈牙利，生態問題也是沒有進展。

當匈牙利踏入過渡期伊始，環保主義之作爲一個政治課題是落到右派手上，而這很大程度是由多瑙河水庫的爭論造成的。這項在1980年展開的工程是斯大林派好大喜功的象徵，而在當時的爭論之下，形成了這麼的一幅圖象，即左派主要都是技術官僚，妄顧天然生態環境。右派於是便能夠爭取到同情，獲得了那些看到由商業本位出發而對生態環境造成威脅的人民的投票。

來到1990年代，環保問題的唯一成就，就是沒有在多瑙河上建設水庫。至於生態的其他方面，卻是持續地惡化，危機重重。

社會黨推出的新憲章和新綱領的最基本的缺失，就是執筆者不敢放棄把過渡期的制度變革推至完善的念頭。但在事實上，人民現在已經不同10年前，他們對於制度變革不再抱許多期望，而且也不完全抱歡迎的立場。而且，在這同一時間裡，情況愈來愈顯然的表現出來，左派的綱領和說詞，實在是有需要重新思索，重新制定。

例如，社會黨領袖科瓦奇聲稱，匈牙利的失業問題不是嚴重的問題，因為匈牙利只有百分7的失業

率，落在歐洲平均失業率的數字之後。這個數字無疑不錯，但這只是數字把戲，因為非勞動人口的人數在1990年代初期有急激的增長，而匈牙利社會的僱傭比例仍是十分的低，在1990年代末期，比例仍是在54-55的水平。在這種情勢下，即使官方的失業數字不高，但欠缺職位實在是一個迫切的題目。

社會邊緣化日趨惡化

倘若我們正視匈牙利的吉卜賽人——羅曼人的淒涼處境，就會更爲明白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匈牙利有50萬羅曼人，他們大部份沒有工作，而且國家提供的福利金的實際價值每時下降，所以景況十分悲慘。在1999年時，甚至歐盟也談到，匈牙利發展中最大的負數、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羅曼人問題。只不過，歐盟的立場與匈國的自由派一樣，僅把羅曼人問題視爲少數民族問題和種族問題，假設透過倫理觀和政治代表性方面便可以把問題解決。而其實，除了要解決這兩方面之外，我們也應該看到，羅曼人的貧困化，只是匈牙利從1990年代開始形成一個低下層的廣大過程中一個並行的發展。至於這個過程，則是由「國基會」和「世界銀行」提議的經濟、福利改革政策所造成，而那些提議並且得到歐盟的積極支持。所以，歐盟在1999年把羅曼人問題作爲匈牙利加入歐盟的障礙提出來，實在是歐盟的虛偽。

對於羅曼人和新生的低下階層的問題，應該由匈牙利的左派來提供一個恰當的分析；他們並且應該就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提出一個藍圖，以令社會的內聚力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情勢下得到鞏固。而要是對新資本主義的制度沒有採取一個批判的立場，今天便不可能提出一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藍圖。而採取批判的立場，就是提出注意力放在糾正刻下進行中的制度變革，而不是著眼在制度變革要完成什麼。縱然在21世紀的最初10年內，要使國際主義滲進平權主義的社會政策，不是容易做到。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2月號）



梵蒂岡為反猶教皇行宣福禮

雷特

〔《十月評論》編者按：以下譯文原刊於2000年10月9日的北京《參考消息》「時事縱橫」欄，譯文開頭介紹：「〔本報訊〕『第四國際』組織9月19日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梵蒂岡為反猶教皇行宣福禮》（作者彼得·雷特）」該報改標題為：《從庇護九世根深蒂固的反猶思想看 梵蒂岡在歷史關頭扮演的反動角色》〕

今年9月3日，現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為前教皇、1846年——1878年在位的意大利籍教皇庇護九世行宣福禮，成千上萬名朝聖者出席了宣福儀式。此事再次反映出天主教會根深蒂固的反猶思想。

宣福儀式就是以教令宣告某死者因功德已升天列入「真福品位」。儘管全球猶太人組織和一些奉行自由思想的天主教徒指責庇護九世有反猶劣跡，但9月3日的宣福儀式依然如期舉行。

庇護九世以經常發表反猶言論而著稱。據說他在一次演講中稱猶太人是「遊蕩在羅馬大街小巷中的野狗，總在狂吠和騷擾我們」。他在1848年頒佈的一項命令禁止羅馬猶太人離開他們已經居住幾個世紀的猶太人老城；在1849年他又制訂了一些歧視猶太人的法律，例如猶太人不能在公共醫療機構治病，不能同天主教徒對簿公堂，以及無權接受中高級教育等。以色列歷史學家說，這些法律成為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的借口。

英國著名的教會學者歐文·查德威克教授說，庇護九世的一些反猶劣跡「已經瀕於犯罪的邊緣」。例如，1858年他曾下令綁架一名六歲的猶太男孩，強行為他洗禮，此事在國際社會引起公憤。

庇護九世還以奉行極端保守主義著稱。他曾將80種觀點斥為「異端邪說」，其中包括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理性主義，以及一些能促進社會進步和豐富現代文明的一些思想。

今年梵蒂岡在被迫取消了為庇護十二世教皇——

即眾所週知的「希特勒的教皇」——行宣福禮後，依然決定為庇護九世舉行這種儀式。前神學院學生、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研究人員約翰·康韋爾在評價庇護十二世時說，這位戰時教皇的內心深處有極端厭惡猶太人的情結。

二戰結束時，梵蒂岡曾向成百上千名納粹份子發放偽造的紅十字會護照，幫助他們逃離歐洲。許多歐洲教堂都曾有藏匿戰犯的不光彩歷史，這些戰犯大多逃到了拉丁美洲，其中包括「大屠殺」的指揮者阿道夫·艾希曼、克勞斯·巴比和安特·帕韋利奇等。這些人都曾以牧師身份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包括巴比在內的一批納粹份子甚至還成為拉丁美洲獨裁統治者的顧問，將「第三帝國」的迫害和折磨人的手段搬到了那裡。

去年約翰——保羅二世曾計劃將新千年定為教會的「洗罪年」。梵蒂岡發表了一份長達14頁的文件，為教會在二戰時的表現進行懺悔。今年3月，教皇在訪問以色列期間曾在耶路撒冷的「哭牆」祈求上帝饒恕天主教會過去的罪孽，並承諾教會將來一定會善待猶太人。

除了這些道歉之舉，梵蒂岡從未闡明它將如何幫助「大屠殺」的直接受害者。此外，天主教會仍然拒絕公開同「大屠殺」有關的檔案資料。美國財政部的一份文件指責梵蒂岡藏匿二戰期間納粹從克羅地亞搶奪的當年價值2億瑞士法郎的黃金。據說這些黃金曾被用於幫助納粹份子逃離歐洲。

天主教會支持納粹政權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反猶情結，教會在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所有轉折關頭幾乎都扮演了反動角色。

今天它仍在扮演著這種角色，這從梵蒂岡堅持為反猶的庇護九世教皇行宣福禮就能反映出來。去年梵蒂岡反對西班牙以違反人權的罪名引渡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就在前不久，梵蒂岡證實去年12月16日，教皇曾接見奧地利極右翼政黨領導人海德爾。

華爾街的經濟持續增長之夢

溫斯坦

〔編者按：下面的文章寫於2000年9月末左右，該文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思想方法，剖析了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官方看法只是一個夢，這個夢很快便破了，在短短幾個月之後，他們便被迫以連續減息，來企圖阻遏美國經濟走向衰退。由此看來，這篇文章有力而準確地評估了美國的經濟，並沒有顯出其過時。〕

美聯邦儲備局主席阿倫·格林斯潘曾經要提高利率，使美國過熱的經濟降溫。他知道如果經濟繼續加溫增長，遲早一定會走向反面。他希望輕輕推動一下股票下跌，使經濟軟著陸。

那些長期持樂觀態度的股市顧問和投機家們無視經濟的衰退，「吵吵嚷嚷」預言經濟的無止境增長，及共同利益和股價的普遍升高。他們下了十年以上的賭注。

對於前所未有的經濟持續增長這一事實，作者阿列克斯·貝蘭遜在《紐約時報》（2000年9月9日）的商業欄目上，簡潔說明了這樣的觀點：

更高的生產率增加了公司的銷售能力而不需要增加工人。即使有增加勞動力的要求（因之工資會提高），共同利益仍然隨著工人生產率的提高而同步提高，比總體工資的提高要快得多。而且，加班加點，賺更多的錢，會引來股價上漲；而股票就是公司未來利潤的部份。

而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都接受這種一時流行的左道旁門觀點，認為美國可以持續提高利率，使經濟的增長不致引發通貨膨脹，應感謝電腦和訊息技術的進步。

假如這個觀點僅僅來自華爾街的「吵吵嚷嚷」的種種說法，這不會有太多的意義。但，美國儲備局主席也支持這種觀點。說起來，格林斯潘還是最早提出這種觀點的第一人呢。他認為，「新經濟」——指建立在電子處理的訊息技術基礎上的經濟——特別是在全球化經濟的美國企業部門，大大推動工人生產率的提高。

要拆穿這些把原本就是十分複雜的經濟過程簡單

化的觀點，必需確認一些基本事實。

首先，工人生產率有過突出的迅速發展的經歷，這是不成問題的。這一點並不新鮮。在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一般說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都是趨於提高的——包括基於蒸汽機、電力、內燃機、自動化等等的廣泛應用使勞動生產率非常迅速提高。

但，生產率的迅速躍進，並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生產由繁榮到衰退的循環週期；也沒有絲毫證據表明不景氣一定不會隨著最後的繁榮而來。

像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那樣有影響力的人，為何有必要參與如此草率地議論資本主義的規律呢？說起來，假如資本主義的前景真的如同所畫的玫瑰花一樣鮮艷，為何還要花氣力去解釋呢？為何他們不舒舒服服地躺在靠背椅上去享受永恒的資本主義繁榮的幸福生活呢？

他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在人們大吹大擂的背後，潛伏著真實的憂慮，這就是全球化的增長已達到了頂點，而由繁榮轉向衰退正以快步走來。因此，格林斯潘的聲言，把問題說得很簡單，祇是企圖使他的資本主義伴侶相信，好日子還沒結束，投資是安全的。

必須肯定，經濟的增長能夠堅持多久，達到什麼程度，心理的因素起一定的作用。但它僅僅是包含在整個經濟過程的諸多因素之一而已。

英國作家G.K.Chesterton認為生活是「邏輯學家的陷阱」。因為生活幾乎是，但也不全是理性的。他說：「生活就其自身而言，似乎祇有些少是公式化和有規律的。它的理性是明顯的。它的非理性卻隱藏著。它的野性潛伏著等待發洩。」

其他工業大國像格林斯潘那樣的人，都是受到與他們同等地位的人的委託，去管理經濟，並及時發現和克服他們不曾料想到的問題；當這些問題一露頭就能夠使它們不致釀成大禍。

現在，問題十分明顯，在1999年，歐元作為歐盟的通用貨幣，與美元的比價為1：1.17，而到2000

年，已下跌至1：0.847。這就成了嚴重的問題了。

而更壞的事情是在同一時期，每桶原油價格上升到十年來的高峰，37.20美元。

下跌的歐元和上漲的油價

首先，世界資本主義的真正的活動家，和像震盪器那樣的人物（shakers），非常擔心歐元的下跌和原油價格的上升會影響美國的繁榮和全球經濟的惡化。

我們記得，專家們曾盛贊美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乃係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唯一動力。世界經濟的命運比以往更緊地繫於美國經濟。

我們還記得歷史上類似的事。在20世紀的20年代，美國經濟（像今日一樣），以飛快的速度增長，按照當時（也像今日一樣）天花亂墜的報導，說「每個人」從股市的投機中都發財了。「瘋狂的20年代」美國經濟造就了大批的百萬富翁，這是眾所週知的。與過去情況不同的是，今日美國經濟不僅造就百萬富翁，還造就了一個新的百萬富翁軍團。

在「瘋狂的20年代」，當美國的有錢人更加富有的時候，歐洲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停滯，一個接著一個為一連串的革命前夜和革命的危機毀壞了。無論如何，「瘋狂的20年代」是如何結束，「大蕭條」是如何開始的，這同樣是個古老而又十分令人沮喪的故事。

現在，對美國經濟懷有更多的期望，沉浸在瘋狂的90年代的歡樂中。但美國既不是生存在70年前與世隔絕的真空中，今天也不是與世隔絕。今天是全球化經濟，當美國經濟陷於衰退時，整個世界就會捲入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激烈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的漩渦中。

今天，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與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更緊密地纏在一起了。所以，世界第二大重要的貨幣歐元的跌價，就會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惡化的先兆。

大約在9月20日開始，世界經濟潛在的危機，突然公開化了。新聞傳媒立刻就注意到歐元的跌價和原油的漲價會使全球經濟的穩定受到嚴重的威脅。

《紐約時報》的一篇日期註明為9月20日的新聞報導說：「歐元的暴跌和燃料價格的迅速上漲成了今日世界頂級的財政官員在會議上優先討論的主題。」作者約瑟夫·凱恩還報導了官員的反應說：

「法國的領導人在工業國七國集團於週六週日在此集會時提出警告，認為原油和汽油的漲價已引起全歐洲的抗議。他要求共同確定原油的最低價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高級官員警告高油價的危險，而且異乎尋常地直率提出，要求七國集團進行干預以加強歐元……。」

「疲軟的歐元和原油價格結合起來，這在歐洲使人感到特別危險。這是個新的信號，表明地區的生氣蓬勃的經濟可能要減慢發展速度了。今天，舉例說，誰也沒想到意大利竟宣佈按季度減慢經濟增長的速度，並要監視德國的經濟動向。」

丹麥好幾年前便拒絕建立單一貨幣條約，在9月28日舉行全民投票反對參加歐元。

這些都給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力量七國集團施加壓力，不管喜歡不喜歡，它們被迫試圖改變下滑的歐元。

關於七國集團是否要維持歐元，同一期的《泰晤士報》報導當時領導人的想法是：

「歐洲的一些高級官員暗示，他們贊成干預。但財政部長羅倫斯·H·舒麥思則表示不同意，認為沒有美國的參與，任何干預都會帶來更大的失敗風險。

任何干預都會失敗。這使克林頓政府很為難。耗費大量美元推動歐元升值而使美國貿易出現赤字——今年預計為3540億美元，這是不能忍受的，會使經濟受到削弱，和傷害副總統戈爾的總統競選。」

倫敦的《金融時報》在9月22日報導：那些支配世界經濟的人的一般觀點認為，要挽救歐元，需要有鐵達尼號油輪那樣的龐然大物才能把它翻轉過來。這位記者寫道：

「分析家認為，歐元滑坡的真正原因在於歐元從歐洲地區長期外流。在高回報的承諾下，歐洲的公司和股票投機商都被吸引到美國去。

「當投機的攻擊會受到中央銀行的干預所抗衡時，資金的流動很難回籠。」

《金融時報》9月23、24日的報導，使所有的重要新聞傳媒和金融投機商受到意外的驚嚇；報導說：「中央協調銀行要介入支持歐元，認為通貨的軟弱已變成全球的問題。」

但傳媒一般認為，干預並不使投機商感到吃驚。歐盟、英國、日本和美國的中央銀行去收購估計約值20-100億美元的歐元，相對說來是很小的數目，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甚至沒有人知道，這樣小數目的

經濟援助是否能解救歐元的困境，能夠維持多久。

比過於簡單化更壞

現在，我們把問題置於總的世界狀況下來考慮。我們要回到開始討論的題目上來，即格林斯潘力求提高利率使美國經濟降溫，以求能夠軟著陸。

美國同工業國家七國集團一起用美元購買歐元，企圖制止歐洲通貨崩潰，其結果正好與格林斯潘提高利率，使大量資金流入美國這個目的相反。

事實上，如果美國政府要花太多美元去挽救歐元，美元的價值也會下跌。

如上所說，任何干預都會失敗，或者是損失好多億美元，使美元的信譽盡失，或者是歐元得到挽救，而使美元失去供求平衡。

且看9月22日《金融時報》關於美元信譽下降的報導吧。

在討論到生產率的提高不一定能增加得益（這是官員們承認的）的時候，作者寫道：「事情引起了歷史的回憶。日本經濟持續增長的優勢曾是80年代的普遍話題，而今日為什麼很少聽到了呢？假如美國（挽救歐元）失敗，這就意味著消費信譽盡失，證券市場崩潰，美元暴跌，物價下降。這樣，要其他各國避免

重蹈覆轍是很困難的。所以克林頓總統警告說：汽油會是個起爆器。

我們要記住，與類似格林斯潘的自信相反，說「新經濟」和比總工資增長得更快的生產率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事實上，通貨膨脹卻在飛快地到來。美元「超值」這個用語，祇不過是用來掩蓋美元已經喪失其「絕對」價值的一種說法而已。

這是世界貨幣制度建立在金本位制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如今世界各種貨幣的價值是互相比較的。它們的價值會一起或多或少地下滑，它們喪失價值原因在於通貨膨脹，而人們卻要掩蓋這一事實。

正是在南亞各國十分脆弱的貨幣的崩潰威脅著全世界，擾亂了世界貨幣制度，金融投機家感覺到美元或其他世界重要的貨幣軟弱無力時，全部用（貨幣）紙牌搭成的房子，就會突然坍塌，那時候就不會有什麼貨幣有能力來解救了。

正如我們看到的，美聯儲局首腦格林斯潘給予首肯的華爾街那些「吵吵嚷嚷」的論點，即所謂「共同利益會隨工人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比總工資的增長還要快」，這種說法實在是錯誤的。

（蔚然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2000年10月）

資本主義的環境危機 會給人類前途帶來什麼？

謝潑德

自從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由於利潤制度作祟，地球上的自然資源越來越大規模地消耗殆盡，這個過程繼續下去的後果，定使地球的生態平衡發生迅速變化，終究有可能導致人類毀滅，這決非危言聳聽。

所有的森林受到破壞，所有的海洋正遭受到威脅生命的變化，我們呼吸的空氣，越來越被毒化了。

自從工業革命開始，因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而使礦物燃料作為主要工業燃料以來，地球的生態體系起了很大變化，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帝國主義用原

子彈轟炸長崎、廣島，這就證明技術發展使資本主義有能力毀滅全人類。從那時到現在，核威脅和核破壞的潛在力量已是昭然若揭的現實了。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似乎還不很明顯的產物，那就是為戰爭目的而發展起來的技術已經永遠改變了化學和物理的作用。這些產品的試驗僅僅為了在戰時使用的有效性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安全。

在「通過化學改善人類生存」的幌子下，生活和生產都起了變化。例如所謂「奇跡般的纖維」——石

棉到處在使用，殺蟲劑（DDT）撒滿了一切。在引進這兩種物質以來的20年後，因它們而引起癌症的死亡人數開始大為增加。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合成有機化學產品的發明和生產，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已增加100倍，增加的倍數是以幾何級數計算的，每隔7-8年，便增加一倍。

80年代末期，美國生產這類產品每年高達2千億磅。多數這類新合成物和藥品本應有利於人類。但不幸得很，在經過測試的約有3%的化學產品都是有毒的，而且有長期的潛在危害性。

雷切爾·卡森的警告

雷切爾·卡森是第一位科學家，出來解釋新的殺蟲劑、肥料以及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潛在危險。他寫的第一本書《沉默的春天》談到了環境（保護）運動的開端。這本書解釋道：癌症和其他疾病已經成為世界食品系列中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出現在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以及所飲用的水中。

如果生產模式不改變，雷切爾·卡森在他的書《我們周圍的海洋》中，對未來的災難作了如此的預言，他說：這是一件很有諷刺意味的事，海洋原是生命發源的地方，而現在卻受到其中一種生命的活動的威脅。但是海洋儘管沿著不利的方向起變化，卻會繼續存在，這種可怕的威脅性，仍然返回到生命本身。

儘管35年前，卡森的警告已經提出，環境（保護）運動也已開始，但是環境受到資本主義破壞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反而一再升級。

升級的一個例子是全球正在變暖。全世界冰河的溶解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證明。

位於南美洲的奎爾克卡雅冰冠，是世界上好幾個最大冰河的發源地，正在迅速地溶解下去。從1930到1990，這冰冠每年以3公尺的比例縮小。1990年以來，又以每年大約30公尺比例不斷地縮小。

南極冰架後退了50年。在這50年時間間隔中，縮小的總數大約是7,000平方公里。從1998年10月到1999年3月，南極冰冠也已後退3,000平方公里左右。

冰河縮小面積的高速增加本來是可以預見的。近來對南北極冰核的研究，證實了全球變暖很可能不是一個漸進過程的現象。

冰核研究表明：地球氣候變暖，開始是漸進的，

接著突然增加到以大約華氏20度速度，結束了12,500年前的冰期，更重要的是，刺激這種突然變化的古代二氧化碳層，要比今天大氣層中的上升濃度低得多。

當尚未發現這些現象之前，地球變暖僅僅是被看作漸進性的，（在過去40年中僅升高華氏4度，但到達2050年或2100年時，全球變暖將達到一個危險局面。這種新的跡象證明；現時的漸進性變暖會發展為驟然性改變。

如以華氏20度的幅度增加，一當冰冠融解於海而提高了海的水平（如果所有的冰冠都化解時，海的水平面將升高約260英尺，那時洪流將會淹沒世界大多數城市和工業中心，地球變暖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以及對人類前途的威脅，必將成為與人類直接有關的問題。

隨著全球變暖，全世界的海洋、淡水、地面和空氣不斷受到污染，這將使人類以及其它生命品種的命運成了問題了。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有關地球最高首腦會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在演說中表達了這些問題的緊迫性，他在演說開始時說：

「一個最重要的生物品種——人類，由於動植物生長的自然環境遭到迅速、遞增的破壞，正處於消失的危險中。當我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時，實際上要防止這種現象，幾乎是為時已晚了。應該說，人類消費社會對這種駭人聽聞的環境破壞應負主要責任。……如果明天來做我們很久以前就應該做的事，那是太晚了」。

就這個意義來說，為斑鼻、蝸牛型飛魚以及其他瀕臨絕滅的生物品種的生存權利作鬥爭時，同時也就表示著最值得關懷的應是人類本身的生存問題。

為人類生存權而戰

為環境而鬥爭，也就是為人權、為物種的生存而戰——為環境的正義而鬥爭，這是越來越明顯的了，按照托瑪斯·傑斐遜的話來說，我們需要保護人類的「不可須臾離開的生存權、自由權以及幸福的追求權。」

我們應當提出如下的要求：

·所有的產品在投放市場以前，必須先化驗是否有毒害。在沒有確定這類物質是否有毒害之前，目前流行一套辦法，即以人類作試驗對象或設法取得人體

器官的計算都必須停止。

- 有毒物質的生產必須停止。在使用時必須選擇含毒量最少的物質，直到消除一切毒素。

- 必須大力發展地心吸力、風力和太陽能作為能源以取代礦物燃料。

- 當前提到世界日程上的最高優先權，應是消滅污染和發展科學，以保持地球作為人類健全、衛生的生物圈。

- 數萬億美元的浩大軍事開支必須停止，轉而把這數萬億美元用來恢復人類的生活環境，甚至在冷戰結束後的1991年，軍事開支仍高達1萬億美元。

- 對那些與污染環境有關的公司利潤，必須徵收百分之百的稅款。

環境保護運動早已提出了這許多要求，過去30年中，許多成文法律也都包含有其中的一些概念。然而，儘管有了這些法律，環境破壞行為仍然容許繼續存在，因為這些法律條文常常由於包含著「經濟可行性」的調和概念而被沖淡了。

經濟可行性的實質意義便是：經濟性企業的利潤決不能從屬於環境的需要。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環境與安全法律總是在科學與商務間相互妥協，相互折衷。

事實上環境破壞、疫病流行以及死亡，已經成為生產的組成因素，如同戰爭破壞和死亡人數成為一切軍事鬥爭的組成因素一樣。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職業環境、工廠、車間成為「殺人場所」。單以美國為例，至少有35萬工人得了癌症等職業病，每年死於這種職業病的工人高達5萬人，有人估計要比這個數字高出很多。

藍領工人和農業工人得癌症等職業病所佔比例最高。因為他們在工場接受的高劑量含毒化學製品，要比其餘部份的人口多得多。最後，這些毒素由於成為工人職業環境的一部份，擴散到全體工人階級中去。

科學和技術是為了防止職業病的增加而存在的。但是，以利潤為動力以及資本主義劇烈競爭卻阻礙了這種可能的落實，也破壞了適當注意安全措施。

科學和技術本身決不是保持環境安全的阻力，這個阻力卻來自資本主義制度，來自生產和科學都必須為了追求利潤這個至高無上的原則。

大多數有關環境研究的報告，都表明環境受到破壞已成為我們社會中帶有全球性的癥結，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加速了對地球的破壞。

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條件下，要想把必要資本投下去，來完全改變這種破壞性，在經濟上來說是不可行的。

在現實世界裡，資本家謀求利潤的權利，是同我們的基本權利直接衝突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資本主義制度已成為人類的威脅。傑斐遜的話「人權是不可須與離開的」，意思就是所有這些人權是不可代替的。當一切衝突到來之際，人類的生存權必須代替少數人的謀求利潤權。保護環境安全權就是不可須與離開的人權。

由於環境受到破壞而引起環境病，已成了全球所關心的問題，這便要求全人類集體行動起來，為了我們總體利益，為了物種的生存權，必須去矯正問題，去搬掉資本主義的絆腳石。

我們所需要的社會是：人類在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都能控制住整個環境。

這樣的社會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來保證做到：凡影響環境的一切決定，都要經過全人類的民主監督，唯有這樣，物品才是為了人類需要和生存而生產，而不是為了利潤、為了毀滅人類和其他物種而生產。

當生產手段為共同所有，當一切財產財富受共同控制和共同保護時，科學以及社會將會與生態系統和人類前途相協調了。

有了這些目標，我們便可開始建立一個更有效的環境運動，當我們為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破壞性的方針路線而繼續組織起來時，我們能夠而且必會改造這個世界。

按照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話來說：「我們決不可懷疑，少數富有思想和高度責任心的公民定能改變這個世界。歷來就只是這麼一回事。」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4月號）



圖為美國一間燒煤的工廠每天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資本主義新生產秩序誕生了？

威爾諾

在發生過1997-1998年的動盪（亞洲危機、巴西危機和俄國危機）之後，美國仍然維持經濟增長（現在，人們廣為知道，這個增長的週期，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維期最長久的），而且，在西歐，儘管經濟增長有著局限，但看來也是得到了鞏固。以至在東南亞，除了日本仍然不明朗之外，也是有著某種程度的經濟復甦。

不過，這一連串同時發生的有利局面，並不如那些趾高氣揚的「新經濟」論者的提法那樣，認為是「新經濟」的勝利。正要相反，這種局面本身，對「長波期」的演進，並沒有說明什麼。也所以，我們不能排除，譬如說，金融市場下挫，或許會對增長帶來衝擊，使增長放緩。

那些認同我們這個派別的經濟學家，在長達10年裡，對於如何界定目前這個經濟局面的性質，抱有程度不同的猶豫態度。直至目前為止，他們一般所秉持的見解是：新自由派的政策，是不能夠在中期裡湧現一個具有勃勃生機的增長體制的基礎。以下，本文提出一些修訂這種分析的元素。

曼德爾的長波分析架構

由曼德爾所界定的資本主義史的分析架構，是建基在維期數十年、相繼發生的動勢之上。在這個「長波期」的動勢裡，上升期（擴張性的）與下降期交替發生。資本主義的第4次長波期，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在美國是更早一些發生），至1960年代末，經歷了擴張的階段。

從197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了長波的下降期。曼德爾追隨托洛茨基的見解，反對孔德拉季耶夫，堅決認為資本主義的內部並無那樣的一種機制，是可使資本主義從一個衰退的浪潮自動走向擴張的浪潮。所以，為了瞭解一個簇新的上升期的走向，便有必要把「超經濟的」因素（戰後歐洲的社會關係的變易）考慮在內。

就最近的發展來說，審視世界經濟是不是仍然處在長波的衰落階段，還是它已經進入了一個簇新的上

升期，這是饒有價值的。所謂「擴張性的長波期」或「長波的下降期」這一類表述，由於可以被詮釋為認可了有一種持續發展的節奏，所以容易產生混亂。而尤其是，這種表述，有時是隱約地指稱1945-75年這段時期，而這段時期的平均發展的紀錄，又是大大地超乎了資本主義長期來的紀錄，所以便更加產生混亂了。

由法國經濟學家P.多克斯（P. Dockes）和B.羅斯爾（B. Rosier）所使用的「生產秩序」這個名詞，無疑可以讓我們能更清晰的界說以下這個分析性的課題：資本主義是否成功的做到了重新建構規章機制，使之能夠保證一個穩定的中期，擴大生產，並且把利潤率維繫在一個滿意的平均水平？

每一項生產秩序有賴於下列四種元素：

- 1、在分析資本積累的模式時，須注意到兩個方面：企業和金融的結構；資本和勞動的關係；
- 2、是物質生產力的一種；
- 3、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用來確保勞動力向經濟秩序屈服；
- 4、國際間的等級制度的一種。

我們繼而將談到那些看來足以表示出資本主義主要的結構性演變的特性的元素。先從物質生產力開始（但不表示我們認為這個元素是最重要的）：新科技和工作程序的編制。

新科技的作用

對新科技和它的衝擊的分析，關乎到把3個層次區分開來：新產品（貨品、物資和服務）、現有產品的演變，和生產及流通的程序的演進。

在1980年代期間和1990年代初期，新科技基本上是涉及到上述最後的一個層次；而在較少程度上，也關乎到第二個層次。能夠迅速處理大量資訊的技術，容許了生產程序向市場缺口作更迅速和較少風險的調節，重新進行組織（即所謂「及時趕到」和「零存貨」）。所以（而這是個極端的例子），美國微型電腦製造商岱爾（Dell），可以能夠在它屬下的部

份工廠，把生產製造期編配為二小時，從而做到清除全部存貨。

這由數種因素的聯合而得到解釋：使用互聯網接訂單來與供應商打交道；把供應商和工廠安置到近在咫尺、使工廠專門化；及毫無疑問的（雖然論述這個案例的文章沒有談到），是要求工作人員有高度彈性。此外，新科技也有利於把部份工序向外分發。

最後，電子貿易的可能性容許了供應商的轉化（至少是其中一部份的供應商），及通過用提早放緩資訊的傳送速度而把開支削減，把它們投進競爭。所以，在2000年3月，聯合汽車廠、福特汽車廠和佳士那汽車廠便宣佈，創立「B到B」（從業務到業務）站台互聯網轉換站；而在4月，雷諾和日產汽車廠也宣佈加入這個轉換站。據美國製造商估計的收益，將達到每部汽車的成本的1成。不過，雷諾車廠對於這一點，是較為謹慎的。

諸如此種工具，將使朝向「零存貨」的走勢進一步增加，並且使供應配合需求。至於普遍地把供應商投向競爭，則反過來或會和網絡維持穩定聯繫發生牴觸；所以，雷諾車廠便宣佈，這方面的競爭將不會影響到第一線的供應商。而通用電器公司便表示，通過上網購買的價值21億美元的供應，將會節省2.34億美元。

一般的狀況是，「實業企業界押下的股本，是使用新資訊科技來削減存貨和相應的開支，縮短送發器材的延誤，提早發展新產品的循環，減少發行成本。總的來說，客觀目的就是要大幅改善工業活動的圖利。」（見P.勒梅爾著的《尋求新經濟》，載《法國筆記》2000年3月號第295期）

然而，即使在近年來，在「新經濟」地區的開路先鋒國之美國，雖然生產力的復甦是玲瓏可見，但新經濟對全球生產力的衝擊，在當前仍然相對的有限，比起1972年之前所獲得的生產力的收穫的紀錄，還是很低下。而且，事實上，在通訊科技的生產力方面的得著，與其他經濟部門的生產力有著相當的鴻溝。

新科技的生產力限制的分析

這可以從多方面來分析：

■ 這或許是資本存貨的轉化與生產力的增長之間常有的脫節（電腦佔資本存貨的份額仍然有限；在美國，只佔訂單的2%）。還有，一些經濟學者指稱，科技的急激更新，使公司更頻密地更新生產資本。也就

是說，生產需要更多的資本。

■ 也或許是，新的生產方法引致直接生產開支之外的開支增長，例如路面運載商品的發展。此外，看來顯然不過的是，新科技的效應，是按照不同部門或同一部門之內的運作的不同，而使階段各有不同。所以，在電子商業中，新科技由於擴大了買者的資訊的可能性，從而能對購買的決定條件產生直接的衝擊。可是，一旦選定了供應商，餘下來的存貨管理和送發之類的物資問題，是與通過書信往來的傳統企業所要處理的問題，沒有兩樣的。

那麼，應用了商業新科技是否有間接的效應，使在作購買決定的時刻擴大了競爭的可能性，引致供應商的生產力有所收益——是否就是這樣呢？最後，有需要把這項事實考慮在內：一些有時在事前未經充分研究而對新科技進行的投資，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 又或者，最後是，雖然當前一片歡欣快慰（那是遵循了冒著通貨萎縮之險的論說），新科技的引進，是在市場銷售的孔道仍然受到工資制約所窒息的環境下推行的。

再者，那些趾高氣揚的，指「高科技」創造了職位的論說，看來並不怎麼有根據。按J.加德依（J Gradrey）的估計，在美國，與新科技有關的合資格職位，只佔新增職位中的一小部份。從1986年至1996年，新增的職位，壓倒性的多數都與電腦、數據技術或互聯網的職位無關。

「高科技」經濟活動的僱員的數字之所以有高增長率，是由於那些行業的僱員的數量，是較其他行業為低。從1986年到1996年，美國的飲食業增加了1.6百萬個職位，醫療業新增了2.9百萬個職位，而資訊科技新增的職位不足70萬個。

而對未來的估計也有所說明：從1998年到2008年，在美國5類增設職位最多的行業，是分析員（增57.7萬個職位）和「普通經理」（增55.1萬個職位），而貨車司機（增49.3萬個職位）、收銀員（55.6萬個職位）和零售員（56.3萬個職位）也是有所增加。數據技術行政人員也將會增加77%，但這方面只有著6.7萬個增補職位。

再者，在高科技部門的一些工作，是屬於古典的生產性職位或商業職位，如流動電話之需要工人來生產，送發和推銷人員（請參看下文有關阿馬遜電腦傳銷公司的工作條件）。

近年來的一些新元素，是一些新科技產品轉化成了「大眾」的消費品，如微型電腦和流動電話。隨同它們一起擴散的，是那些相關的產品（軟件、服務）。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貨品經由生產者和擴散者作廢的速度愈來愈快，而這容許了把一再更新的市場擴大，但與此同時，原先的基本配件市場，卻仍然未達到飽和。

重新編配工序

令人力分割化，是對工作流程進行重新編配時的避雷針。重新編配有兩種互補性的方面。一面是關乎到生產單位：把單位的規模縮小，把單位間的關係通過網絡來代理；另一面，是關乎對「人力資源」的管理。

工業為打破工人大規模集中而進行的僱員縮減所造成的結果，是公司的平均規模也趨向縮小。在初期，外發工序只限於外圍性的經濟活動。到了現在，分包合同不僅影響及某些「配件」（如汽車工件），而且還廣及到一些生產的工序、管理和研究工作（雷諾車廠的研究發展中心，即所謂的「科技中心」，其中外發佔了12%的勞工開支）。

藥劑化工業的特點，是把研究工作外發。新設的汽車生產中心的特色，是在「建造商」、訂單供應商和分包合同商的同一地點設立。

隨同「生產分散化」的現象而來的，事實上是金融的更強度的集中。人們現在流行稱頌的中小型企业，往往都是聯合大企業所包攬的一員；所以，在1994年的法國，由聯合大企業控縱下的，僱有200人至500人的中小型企業的營業額，佔了70%，較1989年的44%為多。

還有，企業傾向於分成各自自主的子公司。聯合大企業的機構有時投入互相競爭，而它們間的關係是契約性的。企業被歸結為「利潤中心」。

人力分割化的形式，從而可以是形形色色，視乎企業所在地的該國的公共機關，是怎樣的形式。

例如，在歐洲4個國家裡做的一個調查，得出了這個結論：該些國家的汽車業的分包合同商，它們使用的彈性編配工作的方式，皆各有不同，分為超時工作、臨時工作和短期工作的模式：西班牙，通用短期合約；而英國的製造商好用超時工作（在這個行業，保護工人免受開除的法律保障不太奏效）；在法國，喜用臨時工作。至於德國，由於有較嚴格的勞工法例

（在這個調查研究進行的時候），所以就出現了種種彈性工作的手法。

饒有意思的是，跨國集團的分包合同商集團所使用的彈性工作的形式，是不會依循原公司所在國沿用的形式方法，反而是根據實際製造地點的當地條件來選取方式。換言之，採用彈性工作是一個總的趨向，但具體的形式，則視乎各國的建制結構而定。

再者，在一些「新經濟」行業，它們的生產力的得益，是得助於把工業中慣用的古典的管理方式，應用到新領域。例如阿馬遜網上傳銷公司（網上書店）在德國巴特·赫爾斯菲德市的工場，工人在每7天裡工作6天，每天從早上7時工作至午夜；而工人收集訂單的時間，是有監工看視的。還有，那些書本不是按作者或範圍而分類，而卻是按被訂書的次數來分類；也即是，最多人訂購的書本是最容易取得。

利潤率和金融市場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以來，西歐主要國家的利潤率（按工資和利潤所分享的價值增生來計算），回復到高水平。在法國，不僅平伏了「石油震盪」帶來的衝擊，而且也平伏了由1968年5月和6月的大示威所帶來的衝擊（法國一份經濟雜誌《新經濟》用這樣的一個頭條，來形容法國工人每週工資的實際價值：<工人賺取相當於1958年時的工資>）。

而早在那時之前的數年，已經回復到高利潤率。但長時間以來，這並未有反映到投資去；其中一部份的可動用基金，用在給金融市場的增長鞏固基礎的方面去。在近期，在美國開始，繼而是歐洲，開始恢復了投資，但各公司在全球間卻能輕易的在財政上自足。我們面對著一個看來吊詭的局面：金融市場的肯定作用是可觀的，而大公司卻並非經常需要金融市場的資助。

在法國，公司的財政自足率，在過去數年間已經超過百分之一百；而在美國的公司，它們在全球把資本吸納到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投資的方式），比它們從金融市場拿取出來的要多。所以，金融市場的作用，看來是：用來為投資而集資的少，而更多是用來確保股票資本的流通，和首要的，更是用來訓導股票持有人和工人的紀律。

不過，與新科技有關的公司（電訊、生物工程，及尤其是電子商業）則在很大程度上使用金融市場來為它們的發展獲取基金，及把它們的競爭對手買下

（用股票來償付）。有數量重大的資本是按有發展希望而集結得來，而不是按具體的表現數據得來（一些入於「新經濟」的公司，至現時為止，是一再的累疊了虧蝕）。

當前的形勢還有另一種吊詭：一方面，公司所要滿足的投資回報和盈利性的準則是不斷的高揚（例如有名的15%純利）；另一方面，一些危乎其危的計劃也輕而易舉的找得投資者，例如Boo.com（網上銷售成衣）公司在2000年5月下滑之前，在2年裡「燒」去了1.35億美元。

在1999年和2000年春，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在2000年8月，阿馬遜上網傳銷書店的股票值，相較於1999年12月的歷來最高紀錄，下跌了72%。很難知道，這些現象是不是標誌著市場方面是愈趨審慎，新經濟是不是需要根據更為嚴格的原則標準來集資。

有一些人，他們用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聯成一氣，來解釋金融市場和股票持有人增進了的作用。這一類的分析是可爭議的。就如法國經濟學家F.羅爾敦（F. Lordon）所言：「毋須懷疑，美國的資本主義有好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是一個以股票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但這不等如它是經常的處在股票持有人的權力的左右之下。」羅爾敦就這一點還援引了美國經濟學家J.K.加爾布雷斯（J.K. Galbraith）在1960年代，就美國公司和「科技結構」內的「經理」的權力而作的分析。

不過，不論上述有關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類型的分析是多麼的有爭議，但亦不能否認，雖然美國發生的比歐洲早，美國也是曾經經歷過決策機制崩潰，而致讓股票持有人的權力更為直接（即「法人管理」）。而這種崩潰，現在似乎是普遍化了，它在法國發生了，而且更主要地在德國和日本發生；在後兩國，更是有著公司與銀行結聯的挑戰。股票持有人對工業資本的直接權力，是依仗於在資訊、控制和準則之產生的可及性而得到鞏固。

大型核數公司和顧問公司在國際間廣佈辦事處，但權力的重心基本上是以美國為根基。金融資訊方面的代理公司的情況也相同。上述這些器官，皆是製造行為準則的產生，以把「經理人員」的管理方式規範起來。還有另一點也同樣值得指出來的，就是大公司趨向於把提交業績的報告的規則齊一化，此舉容許了股票持有人有更大的空間，以對他們持有股份利益的

各個公司的演進，提出見解。

「新」資本主義的權力擁有者

有數點值得弄清楚，它們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問題：在這個「新」資本主義裡，權力在哪裡？要展示所謂的持股人民主只是個神話，展示「小持股人的權力，在週年大會的象徵式姿態之外，只不過是形同虛設，或只是從屬於大型的中介者」（F.羅爾敦語），是毫無困難的。

同樣不難展示的（雖然有些人幻想這會很困難），是工會的退休基金，或一些所謂的「倫理」基金，並不構成足以對抗制度邏輯的工具。以下是更準確的分析：

■ 作為公共機構的資本主義（這可以由僱員來管理）與嚴格意義上的資本家（收入主要來自資本所有權的那些個人）的接合點，部份來自於那些傳統的、或新興的資產階級家族；另一部份，是那些由受到選擇股票或其他參與資本的方式的恩澤，搖身「變為」資產階級的受薪經理。

■ 在法國，有家族資本主義捲土重來之勢：在1999年，家族擁有30%的50所最大公司，較1984年的11%激劇增加。而在同一段時期裡，國家所佔的比例下降了3分之2，從74%。劇降至25%；相形之下，一些家族集團卻是得利於私營化而得到鞏固。這會是法國才特有的現象嗎？還是一個持久的趨勢？

把羅爾敦在《外交世界》強調的「退休基金」的「支配地位」這項總結性的分析擱在一邊不論，上述第一點看來是尤其重要的。米修·平松（Michel Pincon）和蒙尼卡·平松一查爾洛特（Monique Pincon-Charlot）在近期一篇辯論文章裡寫道：「有關於經理人和公共機構投資者（退休基金及盎格魯撒克遜的互助基金）的論說，一般傾向於把資產階級及其家族之身為從新增財富抽款的實際受惠者這一點，像變戲法般打消了。所有這些，皆把那些與或此或彼的父姓有利益勾連的狀況隱藏起來。這是為了造就一個抽象的圖解法，旨在要我們相信，存在有一種無原則的〔資本〕擴散，和資本所有權無限度的擴散。」

工資關係的演進

國家公共機構的構造在這個領域裡，仍然有著重要性。不過，刻下發展中的普遍意義，看來是清楚

的：工作條件個別化（在美國，從1991年至1997年，全職工人採用彈性上班時間的比例，大約從15%升至30%）和工資關係個別化。工資關係個別化，是由下述狀況得到表述：相對於「不規則」的工作合約，「傳統」的工作合約日漸衰落，而且，在一些極端的例子裡，工作合約是由商業法取代勞工法而對工資關係作管制，而那些管制則令人聯想到勞工法面世以前的時代。

這種狀況，事實上是對所有生產領域裡的受薪者的進攻。資本主義在戰後的蓬勃期裡，老闆有權決定工作的節奏，也有權解僱工人；不過，就在這個框架內，工人的工時和月終發放的工資將是若干，會有相當的確定。而且，工人也能夠從服務的年期裡，得到一些優勢（起碼在某些有著集體力量關係的行業裡是這樣）。

所有這些方面的保證，現在是掃蕩一空。〔資方的〕中心目標，是取得人力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同時又削減開支。除了少數的例外，取得員工的忠心已經成為次要。

值得指出的是，工資關係的這種演變，是與「科技革命」（用時髦的用語來說）只有十分間接的關係；而且，這種演變涉及所有行業。在運送工、建造工等方面，可以看到修正傳統工作的極端例子。

《商業一週》的一篇社論，就美國維力生公司（Verizon）工人在2000年8月和9月進行的一次勝利的罷工（美國本地電話和流動電話最重要的接線生之一）事件，作出了如下清醒的總結：「所謂舊經濟和新經濟的區別，往往是個神話。在電訊行業內，工會化的〔傳統電話的古老公司裡的僱員〕裝配工、技術員和推銷員，是和他們非工會化的同業〔新式的公司〕做著相同的工作，有著相同的技術水平。最大的分別，是工會化的員工，享有更大的僱傭保障，有較佳的工作條件，而且，通常都享有更高的薪水。」文章的作者還補充說，美國經濟近期在生產力方面取得的收益，將會在總裁和股票持有人之間瓜分；至於顧客和工人〔的得益〕，將更多地有賴於來自政治強制的政治關係，而較少會來自經濟和技術的強制。」

在個別化之外，我們應該注意報酬不均的發展趨勢，而這方面，只有在顧及到兼職工的發展，才會完全理解當中的狀態。一般來說，過去的20年，是由大部份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愈趨強化的不平等打上印記。不平等的狀況，讓資本的收入大有盈利。

國際分工和權力的等級制

權力的等級制可以十分提要的總括如下：

■ 美國的軍事掛帥和經濟權力，是與歐洲聯盟旗鼓相當的。美國是不容置疑的「捲土重來」，而有關於美國沒落的假設實在不大站得住腳。

即使美國的財政預算案能夠回復為有盈餘，美國現有的財政赤字，仍然是很可觀。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是非常的低，而私人代理公司的負債率卻是十分的高昂（佔全部生產總值140%）。

美國經濟之沒有外在的箝制，無疑是它的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美元仍然獨立於美國的貿易赤字之外，是貨幣的避難所。

■ 在軍事層面，歐洲仍然處在從屬地位。而在貨幣政策、競爭和外匯兌換的領域，由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委員會（在歐洲會議主席的支撐下）施行的歐洲共識，要比大西洋彼岸〔美國〕所實際施行的，是更為教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歐洲聯盟的經濟增長既有限而且是名多於實，所以使貿易在賬面上有盈餘，但卻無從阻止歐元貶值。

■ 至於日本國，她似乎正在從一種經濟管制模式邁向另一種經濟管制模式，或至少，它那特有的資本主義受到很大的侵蝕。這可以從銀行——工業的關係，資本的開放，及對外來產品相當程度的開放這方面顯示出來。在宏觀經濟的緊要關口，局面仍然不明朗；不過，日本現有的盈餘，使它能與歐洲聯盟一道，在財政上支持美國的增長。

隨著歐幣的誕生，具有國際地位的貨幣不再超過三種：美元、日元和歐元（英鎊無疑注定早晚要加入歐幣的）。在過去18個月裡的外匯兌換價的走勢，顯示了國際間在防止貨幣反復上落的動勢上，合作協調不夠。不過，這卻不表示，假如局面真的有這個需要，7大工業國集團是不能夠建立起更加鞏固的協調的。

對國際間的景象的迅速審視，應該把國際機構也包括在內；美國在此間經常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就有關經濟規條方面，「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個三組合，就它們的真正目的來說（而不是就推廣人類整體的福祉來說），除卻不可知的因素（西雅圖、俄國危機）之外，它們遠遠沒有被癱瘓下來，並且也遠不是沒有效率。在這一點上，這對7大工業國集團（加上俄國，便是8大工業國集團）同樣適用。在軍事的層面上，「北約」在經

歷「冷戰」之後存活下來了，並且還贏得蘇聯過去在中歐和東歐的同盟者，加入成為「北約」的新成員。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國帝國，在當下是由各個「平等」國家之間的協作替代了；在這些「平等」國家當中，有一個國家（美國）是可見地比其他國家（歐洲和日本）更加「平等」。

工人組織的倒退

工人階級在數個國家內局部的挫敗，或在全球的挫敗；生產機器的重整；西歐社會民主黨領導層政府的政策，及斯大林主義的倒台，這些皆對工人階級的覺悟水平具有嚴重的影響。在下文裡，我們僅就這個景象的若干元素作出掃視：

■ 在被統治者之間的階級覺悟裡，一些有重大意義的內容成份（顯見的例如由集體而生的希望）衰而不振，但在統治者方面則是心安理得。就像平松和平松一查爾洛特就有關資產階級所寫的：「在今天，唯具有階級本體，為本階級效勞的這些性格，對一個實在的階級能夠被動員起來，最是重要。」

■ 工會運動內，雖然顯示了一些反趨勢（美國「勞聯——產聯」有較為戰鬥性的領導層、1995年12月運動，及在法國產生的「團結統一民主工會」（SUD）），但總體上，工運是在全球間削弱了，沒有了方向。

例如，在西歐，主要工會聯合會對國家、僱主和布魯塞爾的公共機構的依賴相當大（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同時也在物質方面）。由此而造成的影響，是為工會的官僚製造了物質的基礎。法國的「工聯會」是其中的表表者。

■ 普羅大眾與政治機器的日益分家。源出於斯大林派的共產黨相當嚴重的衰落，而社會民主黨派與民眾層份間的聯繫卻是趨於大幅增加（尤有甚者，是這類黨派的領導層愈來愈多的技術官僚，很少有戰鬥背景）。由這種局面而產生的後果之一，就是不投票主義。這種不投票主義是據入息而分。從樂觀的觀點來說，也可以解釋成是某層份的人民的意識覺醒，因為他們看到，據各個黨派當前的構造來說，選舉將不會造成什麼變化。另一種非政治化的形態，是和中層「精英」有關；他們部份地相信，選舉所作的，只是技術性的選擇而已。

在這種種演進裡，不是沒有著抗衡的趨向。除了在工會層面標示的現象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

「新經濟」的某些行業裡，僱員已經開始有所組織，而且是有所鬥爭；另外，也有著新起的反帝國主義的激進性，及在數個歐洲國家內（葡萄牙、英國、法國……），革命左派的力量有了增進。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上述的興起，都是新時期的矛盾下的產物，而不是1970年代的懷舊回潮。

同化和壓迫

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看來是採用了兩種手法，而這又按不同國家而各有不同的程度。

第一種手法是同化的取向，即是通過把報酬或退休金聯結到公司的利潤的機制，把一小部份人力融入到資本主義的邏輯裡去；這當中使用的手法，包括有分股給僱員、設立僱員儲蓄、退休基金，等等。而其中，一般只有經理級的人員才分得股票份額，或分紅的多寡上下有別。運用這些手法的動機，可以是各有不同：訓導一部份僱員的行為紀律（使他們接納較低幅度的工資增幅、促進「效忠」公司，等等）；又或者，是用與金融市場聯結起來的工具，逐步取代建立在集體保證上的制度。

在上述的手法模式內，存有一些意義重大的細節。一些細節暗藏著針對大部份人力的潛力，另一些則是指向更高層的管理級人員。另有一些，是試圖把持有股票的僱員組織成一支特別的代表，又或是使工會具有某種特定的作用，等等。

新自由派每每強調假設會有的增長，以使那些現行收入是相當地依賴著公司的業績，或那些未來的收入是相當地依賴著公司的業績，或那些未來的收入是與退休基金的表現聯繫起來的人力，懷有積極工作的動機。

有一些理論家（如法國經濟學家米修·阿列塔（Michel Aglietta）或英國的羅賓·布萊克本（Robin Blackburn），或社會民主派中的某些派別，都主張持有股票的僱員應該參與到決策層，或僱員對退休基金有控制權（通過工會的代表來行使）。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矛盾；而且，社會民主派的論述，基本上是給自由派的計劃以「左」派的認受性。

第二種是壓迫性的手法。即是用無社會保障和邊緣化來懲罰性對待；而這一方面，基本上是新自由派政策造成的後果。歐洲政府（包括那些所謂「左派」政府）採用了美國的模式，趨向於運用「警察和監獄來管理貧窮」的手法。在發達國家的貧民區裡，除了

警力充裕之外，國家和公共服務的設施都是不足夠的。

再有甚者，是居民中有某些部份人，他們由於受到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和「不文明」所害，會不時要求動用「維持秩序的武力」。不過，在未來，要是社會緊張白熱化，警察還可以派上其他的用場。

結論：資本主義建立了新生產秩序

上述綜論的一切，是否已經成爲了一種秩序，讓我們能夠下結論說，一種新的生產秩序已經到位？

至少在本文作者看來，答案似乎是「是的」。從社會來說是退化的，而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說則是不無效率，某種特定的管制模式是裝置了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資本主義是從「危機」中冒出頭來了；或許，用曼德爾的術語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從1970年代開始的衰退長波期中，冒出頭來了。有這樣的一個時期的變易，不是由新科技釋放出來的一一不管科技有多麼大的衝擊，但科技並沒有自動模塑經濟和明日社會的能力。

相反來說，就是由於在主要的發達國家內的部份僱員，他們蒙受的局部挫敗一再積累起來，從而容許了資產階級不僅能「使工人爲危機付出代價」，並且還能夠爲新規則建立基礎。

在這個分析裡，無疑應該融合其餘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西歐統一的框架，在結構上是朝著施行新自由派計劃的方向而作的部署；第二：蘇聯倒台。蘇聯久矣乎不構成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出路，它的倒台不會惹人落淚，但儘管這樣，它的倒台卻相當地代表著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並且讓資本主義能夠自由自在，毋須要證明它在經濟以至社會領域方面的合理性（還有，我們應該把中國的因素考慮在內。中國在官僚層的驅使下，已經展開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這個過程誠然還未完成，但卻使中國成了國際投資首要的目的地）。

「新經濟」的局限

創立「新經濟」的基礎之所在，是在過量膨脹的資本裡，拿出一部份可供調用的份額，用在一些有更高利潤率的投資裡，這些投資尚且往往是相當冒險的。爲免有任何含糊之處，我們應該強調，「危機」之終結，絕不表示重回到戰後的蓬勃期。美國和西歐經濟在當前的擴張，代表著捲土重來，但這個捲土重

來的表現，是遠不能和1948年——1970年的表現相提並論。

這種增長假如能夠維持，從而最終令歐洲的失業率大幅削減（但這是沒有保證的），亦不會使人力回復到同一化；而且剛好相反，歐洲倒是會追隨美國的模式，維繫人力的分割化，和維繫著大比數的貧民。

我們並且應該把下列因素考慮在內：聯繫到建制的條件，資本主義的新規則內在含有的限制：

■ 市場機會的限制：由於發達國家的緊縮工資，及南方和東方國家的「結構調整政策」而造成；

■ 商品供應的利潤取向之與社會需求之間的不調和；

■ 很大程度上依賴著金融市場而佈置的宏觀經濟的脆弱性。

上述因素，都能導致類似於1992-93年般的重大動盪和衰退。政治權力者和經濟權力者都意識到發生這種事態的可能性。指「石油出口國組織」「不負責」的運動之發生，就是一個明證——在再一次的擾攘不安裡，「石油出口國組織」的國家，便將成爲方便妥協的代罪羔羊。

不論這種模式有著怎樣的起伏，它薄弱的社會忍受性（在許多「潦倒者」和「貧窮工人」——大部人力都有相當穩定的職位，但他們都備受著長期的壓力，並且對自己及其子女的未來並不明朗——的眼中，這種模式的社會忍受性是薄弱的），提供了一個支點，使反資本主義的激進性得以重建，使任何改良主義的出路成爲不堪一擊的選擇。

（本文作者是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內的「經濟工作組」的成員，是一名經濟學家。）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1月號）



防暴警察向示威者噴射胡椒噴霧。

以托洛茨基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二)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二章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

一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及它在不斷革命論上的發展，是帝國主義的一個雙重概念（即政治和經濟的概念）的產物。與希爾費丁、盧森堡、布哈林和列寧等人不同，托洛茨基並沒有發展出一個全面的帝國主義論（獨佔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但是，從他的許多著作中，我們卻發現他對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所開始的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特徵，有一個比較確切而深入的了解，一個已被歷史所證實的深入了解。他了解到這個新時期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之間的關鍵性的差別。

他比以上所提到的那幾個人更正確地將民族國家與生產力的發展（日益增大的國際化）之間的基本矛盾，放在他對帝國主義經濟制度的了解的中心。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一個主要是進步的傾向變到一個主要是退步的傾向，看成為以下事實的一個表現：不但私人佔有（利潤動機），而且民族國家的繼續存在，都漸增地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威脅。這就意味著，世界市場在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中，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如果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是一個他與盧森堡所共有的深入了解，雖然他的出發點和分析方法與她的不同。

在希爾費丁、布哈林對帝國主義經濟的分析中，民族因素仍然佔主要地位。布哈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的貢獻，在他的國家獨佔托拉斯的概念上達到了頂點。日後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只不過是此一概念的一個膚淺的衍生物而已。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比較小心。他比較著重國際聯合企業之獨立於民族國家的管制。可是，由於他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經濟經驗的影響，他在1916年以後，傾向於過份著重這種管制的現實性和長期可行性。

自從托洛茨基從1890年代後期了解到世界市場成為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決定性骨架以來，他對世界

貿易（價值規律在世界市場上的運行）與國家在民族骨架之內對經濟的管制之間的交互作用，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當這兩個因素發生衝突的時候，正如它們在1914年以後和1929年以後所顯示的那樣，世界市場破裂了，世界貿易衰退了，所有競爭者的投資、利潤率都降低了，經濟危機加深了，這整個發展就引向巨大的爆炸，換句話說，引向世界大戰、民族革命和反革命。國家獨佔托拉斯沒有強大到足以在較長期之內抵擋世界市場的壓力。某些帝國主義大國之要實現世界統治的企圖，只不過是想在資本主義的骨架之內克服這個矛盾的企圖而已。〈1〉

生產力終於在比托洛茨基所預測的還要大的規模上國際化了。國家獨佔托拉斯與其說是讓位給國際聯合企業，不如說是讓位給多國（跨國）公司。這些多國公司，就其生產設備及（較小程度上的）財產而言，不但不再與其發源國有密切關係，而且甚至於超越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這就是我們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的那個帝國主義時期的主要特徵。

價值規律的運行，最後分析起來，是被勞動生產力平均水平中的種種差異所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來，是被高於和低於這個平均數的種種偏差所決定。長期說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大國能夠在世界市場中保持它的地位、在世界規模上保持它的資本積累的份額，如果一個與它競爭的大國在許多最重要的工業中，有較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靠股息生活的帝國主義”會擁有霸權這個預測，已首先在英、法、近幾年也在美國被種種事件證明是錯誤的。

世界市場在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上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也意味著，後資本主義經濟（不管我們是否稱之為社會主義或過渡經濟）的優越性，從長遠看來，將會依靠這些經濟之達到比主要的帝國主義經濟所達到的還要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都有同樣的觀點。而且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在單一國家（或者一群國家）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任何期望，從開始，就完全是烏托邦。所以，在俄國或者在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實現一種比世界上主要工業國家還要高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因為後者除了有其本身的

優點以外，還能夠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勞動分工，使它對其有利（而對第三世界不利）。

因此，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就有了一個健全的經濟基礎。世界市場，由於生產力的日益增加的國際化、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國際集中化和中心化，不但在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產生了勞動生產力水平的差異。它也在帝國主義世界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之間，在勞動生產力的水平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換句話說，它導致第三世界的大部份地方的發展停頓在低下的水平上。

托洛茨基深深地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會起來反抗這種被強加的苦難。他從很早時期就著重地指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但會在西方引起反響（例如奧地利的選舉權運動），而且會在東方引起反響（波斯及稍遲一點中國的革命，土耳其的革命前夕騷動）。他於1919年寫給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少為人知的信中預測，從莫斯科到倫敦、巴黎的道路可能要通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中心。〈2〉

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之一，這個世紀最重要特徵之一，是第三世界反殖民主義革命和解放運動的動力，早就是托洛茨基的帝國主義論的一個主要因素了。就是這個因素，給了他的國際主義一個真實的唯物主義基礎。世界革命對托洛茨基而言，不但意味著第三世界群眾的解放的客觀進程，這些群眾既是帝國主義、又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剝削的對象。它也意味帝國主義國家工資勞動者的客觀的解放過程。從1932/33年開始，他又增添了蘇聯的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資勞動者的解放過程。

他了解到資本在世界市場上是正在日益集中化和中心化。這種了解使他得出階級鬥爭也在日益國際化的概念。這個概念不只是著重所有國家的工資勞動者有共同的利益。它的中心思想乃是：必須以工人階級的國際行動來對抗資本的國際活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對抗國際資本的行動不被“民族”利益所分裂、減弱和癱瘓。

二

托洛茨基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概念，是基於對帝國主義時代（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日益尖銳的經濟上、社會上、國與國之間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衝突的了解。這些矛盾和衝突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變化。

大體上說來，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代，大企業喜愛弱國。這決不意味者，當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的時候，它會對在殖民地和在帝國主義中心所發生的最嚴厲的鎮壓提出質問。大企業所反對的，乃是非生產性的、

無必要地浪費的國家支出，使資源不能為生產性資本的策略和增值所用。

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不是資本的缺少，而是資本的相對過剩。軍費在現在，以一種“替補市場”的面目，扮演一個有用的、日益變成必不可少的角色。（這是盧森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帝國主義時代是以軍火生產、軍備競賽為特徵的。它是軍國主義一般化的時代，替軍國主義思想辯護、榮耀軍國主義思想的時代。它是“強國”的時代。

但是，軍備競賽、軍國主義本身並不是目標。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個確切的社會——政治功能。

“強國”是每個帝國主義大國手中的一個工具。它用這個工具試圖鞏固和擴張它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份額。最後分析起來，“強國”是以強力來解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的一個工具。它使征服、保持殖民地成為可能。它使世界瓜分為一邊是帝國主義國家、另一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為可能。它使獨佔資本在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時代，有可能，在必要時，使用野蠻武力來打破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在這個帝國主義的政治概念與對國家的逐漸發展的危機有所了解之間，換言之，與對國家獨佔托拉斯的逐漸變弱的傾向有所了解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帝國主義/獨佔資本之愈來愈容易發生危機，迫使獨佔資本試圖通過反革命和戰爭來擺脫這個危機。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雖然在某一段時期它主要是在那些在瓜分世界中佔不利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顯露出來；在當時，這些國家是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後，它也會在美帝國主義以及像英、法等較弱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顯露出來。

這種作為一個政治現象的帝國主義概念，必定導致一種革命的國際主義。它是革命的，並不是因為它著重武力的使用，而是因為它著重於制伏獨佔資本壓制性的國家機器的絕對必要性。在實際上，那一直是二十世紀所有革命的關鍵點。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是如此，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如此，在帝國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衝突也是如此。

革命國際主義首先意味著這樣一個責任感：與世界任何地方反叛中的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大眾進行國際性團結，不管這些反叛者的意識形態是什麼。這裡沒有簡單的模式。意識形態的面罩能令人非常混亂，而且在長期中能引致可怕的後果。可是，每一次以意識形態的理由拒絕團結，都會有十倍壞的後果，以致不可能與工資勞動者、被壓迫者實現必要的、世界性的團結。

革命國際主義，以這樣子來了解的話，是基於一個客觀的階級概念。這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之一。

不管階級覺悟程度如何，階級總是客觀的範疇。階級覺悟，換句話說，是某一階級的自我了解，是使任何階級鬥爭有成功希望的一個必要因素。可是，把某一經濟、政治衝突定義為階級衝突時，階級覺悟並不是必要條件。否則的話，馬克思說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毫無意義了。

羅馬帝國時代反抗非人待遇、後來通過大舉逃離城市和莊園致使帝國瓦解的奴隸們自然沒有“奴隸階級覺悟”（雖然奴隸主們倒有其階級覺悟）。可是，奴隸們，在客觀上，是一個社會階級，而且進行了階級鬥爭。對階級所下的任何其他定義，只會導致荒謬的結論，而且導致對“實際存在的”工人階級十分不利的實施。這特別適用於後期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和半毛澤東主義對階級所下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後果之一就是：數以百萬計的反抗官僚獨裁的真正工資勞動者們被譴責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對工人們的罷工和暴動加以暴力的鎮壓，則被描述為對資產階級的鎮壓。可是，革命國際主義超越了必要的國際團結的階段。它也包括有系統地、長期地協調真正的解放運動，在中、長期內（有時甚至在短期內）改變國際資本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之間的力量關係。它可以被總結為以下的馬克思主義公式：以工人階級的全球性對外政策來對抗資本的全球性對外政策。

馬克思把這點看成為第一國際的基本特徵之一。值得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甚至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英國的工人和工會運動成功地阻止了英國站在南方奴隸主一邊干涉美國內戰的行動，是主動的全球性國際主義的最重要成就。馬克思於1864年4月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寫道：

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末當存在著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廣奴隸制進行可恥的十字軍征討冒險的，並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階級對於他們那種罪惡的瘋狂行為所進行的英勇反抗。歐洲的上層階級只是以無恥的贊許、假裝的同情或白痴般的不關心態度來觀望俄羅斯怎樣侵佔高加索的山區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在歐洲各國內閣裡有其爪牙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會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

國際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

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份。<3>

托洛茨基一直到其生命終結時還是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個激進主義的、全球化的國際主義概念。真的，托洛茨基當然像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列寧那樣，主要是把國際主義了解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且把主要的著重點，放在工資勞動者們的共同利益、團結一致和行動統一上。像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所有其他的偉大社會主義者那樣，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工資勞動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客觀階級地位，給與這個階級某種進行國際鬥爭的潛能力，沒有一個其他階級，既非第三世界的獨立農民，又非城市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能夠有這種潛力的。歷史已經證實這個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在某些方面，它當然需要加以修正。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包括了一個嚴重的歷史遺忘症，時間和歷史真理的重建將會慢慢地克服這個病症。

讓我們在這裡回憶一下這個世紀所發生的國際團結運動的一些主要例子：新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對卑斯麥之併吞阿爾薩斯——洛林；俄羅斯和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的團結；瑞典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號召總罷工的威嚇阻止了瑞典干涉挪威的獨立鬥爭；意大利工人們在1913年的意大利侵略土耳其的戰爭中實行總罷工和拒絕運輸軍隊；從1913年初到1914年7月底在（瑞士）巴塞爾、巴黎、柏林、布魯塞爾和維也納等地所發生的巨大反戰示威遊行；1918年維也納和柏林的工人們為了支持俄國革命、反對魯登多爾夫的掠奪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議而發動的多次罷工；英國工人們因為反對英國在1920年的俄——波戰爭中威脅著進行軍事干涉而積極準備的一次總罷工，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階級鬥爭的決定性時刻阻止了干涉而且可能是挽救了蘇俄的一次行動；法國共產黨在1925年的法國殖民帝國反對里夫〔摩洛哥一山區〕卡比爾人的戰爭中所表現的勇敢行動；1936-37年與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的運動所進行的廣泛團結；國際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在1941-44這幾年中與蘇聯和蘇聯人民在他們的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所進行的不比過去少感動人的團結運動；在60年代與越南革命在其抵抗美國主義野蠻攻擊的鬥爭所進行的動人心弦的國際團結運動（在意大利和法國之外，這只牽涉到學生和工人階級青年而不是較廣大的工人階級本身）。

然而，諸如此類的歷史平衡表，也應該指出國際團結運動的明顯失敗：（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在當時是中立國家的例子之外，而且就是因它們是中立國

家，所以它們比較容易作出值得人尊敬的反應）工人階級中的廣大層份對於主流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之向戰爭的可恥的投降，缺乏任何反應；對日本帝國主義在30年代在中國所犯罪惡的低水平反應；歐洲工人階級對於歐洲猶太人成為納粹大屠殺受害人這一事實缺乏同情心（除了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工人們的出名例子之外，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意大利和希臘的人民之外）；在1942年和1944年之間沒有能夠與印度解放鬥爭展示團結；在1954年至1962年之間對阿爾及利亞解放的支持非常不足；與1956年的匈牙利人、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1980年的波蘭工人、尤其是與1979年之後在經濟上、軍事上被美帝所擊碎的尼加拉瓜革命缺乏團結。

從長期來看，如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能夠徹底排斥“超級大國”或“主要堡壘”的概念，它才能成為有效的力量。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只有團結運動平等地進行的時候，換句話說，只有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的利益，不管多小、多弱都不會被較高的利益所犧牲的情況下，才能使人相信。除了1921年的單一例子之外，托洛茨基終其一生都在試圖對這個原則保持真誠。他與盧森堡及列寧（除了1921-22時期以外）一起，與最示範的方式，包容了這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4〉

毫不意外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採取在政治上集中於反軍國主義、反戰爭的鬥爭的形式。因為，就是在軍事主義和戰爭上，資本主義社會的野蠻傾向才明確顯露出來。偉大的社會主義反戰鼓動家盧森堡、托洛茨基、列寧、饒勒斯〔法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馬爾托夫和阿德勒等人都在很年輕時認識到這一點，而且熱情地向它抗爭。對他們來說，進入戰爭，就是走向野蠻主義。

德、法、英和奧地利的主流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具有歷史意義的罪過，當他們在1914年8月用最懦怯的方式與這個傳統決裂的時候，必須被大家認知。就是這點，並不是列寧的“宗派主義”，才是國際工人運動分裂的根由，才在人民的眼中使社會主義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可信性成為一個疑問。

因為，在1914年8月14日，在帝國主義掠奪性戰爭之面前而崩潰的，並不只是國際工人階級必不可少的團結。也在那一天被破壞掉的，在那時以後的一段長時間中，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無條件保障人權、無條件保障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等同。就是這個等同，才是工人運動在大戰前的幾十年中得以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與獨佔資本休戰、支持戰爭、支持交戰中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國家、支持軍國主義、支持軍人——這些作

為，必然會導致支持審查制度、支持緊急狀態、支持限制罷工權，為逮捕、譴責、反戰份子的行動辯護、甚至於導致在自己的工會或政黨中也這樣做，而且甚至於導致向當局控告反戰活動份子。這種毒樹的果實，成熟以後，就掉在反革命的懷裡，特別在1918年以後。這種政策的果實，不但包括諾司克和卡普的政變，及盧森堡、李卜克內西、Leo Jogiches、Hugo Hasse、Kurt Eisner、Eugene Levine等人和數以千計德國工人的謀殺。它也包括自由部隊、馮·西克特，而且從自由部隊就直接導致德國納粹黨黨衛軍，從馮·西克特導致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之被任命為總理。

三

實際、積極的國際主義，需要一個國際組織。積極的國際主義，首先要反對軍國主義、軍備競賽、戰爭及支持戰爭的意識形態（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像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崇拜論和國家安全崇拜論那樣的輕視形式）的國際主義，需要一個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在1914年以前第二國際的年份期間，甚至於在俄國革命以後的共產國際早期，盧森堡的口號“國際是我們的祖國”是為數眾多的國家中的數以十萬計、如果不是百萬計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5〉

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是他在參與社會主義局這個第二國際組織中心的時期所快速發展起來的。他積極參加第二國際的許多次大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在1908-14期間的內部鬥爭，採取調和態度。他第二次流放到維也納的時候，他與以考茨基為“中心”的德國黨領導層及Neue Zeit（新時代報）的編輯部的工作關係很密切。在他當時的立場中，有一點機會主義的因素，因此，在盧森堡所極力主張的集體罷工的問題上，他拒絕支持她來反對考茨基。列寧在這個爭論上，為了同樣理由，也採取否定和猶豫的態度。

〈6〉

可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大多數國家社會民主黨的多數之向它們各自國家的戰爭努力的投降，托洛茨基在國際上的角色也就完全改變了。托洛茨基從維也納遷居到巴黎以後，也從一個激進的反戰份子，變成為俄國和法國國際主義者的一位積極組織者。他是齊默瓦爾德會議的最重要發動人和參與者之一。寫出齊默瓦爾德宣言的，就是托洛茨基。他也是第三國際最積極的建造人之一。起草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的集會呼籲書，也是托洛茨基。他是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團中的“核心人物”。不管他在擔任紅軍領袖時的工作有多忙，他在共產國際頭四次大會中仍是扮演一個積極角色，而且參加了它的執行委員會的許

多次會議。

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夜或革命的動盪時期，具有認知人民國家的情緒及其一切的矛盾和不協調的能力。這種共鳴，在他作為群眾鼓動家的活動中，政治家和理論家的時候，以及在他精心敘說策略與戰略的時候，都會顯露出來。他比他的國際主義者同伴們更早、更清楚地認識到“和平”、“立即和平”、“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等口號對廣大群眾會產生的爆炸性效果，一旦他們的對戰爭的熱情讓位於較清楚地認識戰爭在物質方面對他們自己的生活的影響。在戰爭的時候，爭取和平的鬥爭是國際主義的具體形式。（在對“民主和平計劃”作出批評的時候，列寧起初批評“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口號。當他回到俄國〔看到群眾的實況時〕時，他對這一點改變了意見〔不再作出批評〕）。

托洛茨基的觀念被二月革命的爆發清清楚楚地——在俄國本土及國際上——所證實。人民大眾對革命的熱心不可分開地與革命會使戰爭結束的希望連在一起。一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和平的問題開始猶豫不決，他們就開始失去了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布爾什維克之能夠在蘇維埃和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贏取多數，就是因為他們的爭取立刻結束戰爭的鼓動，而這個鼓動，比馬上進行土地改革的呼聲更能激盪人心。十月革命的成功，主要就是因為俄國工人們把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政權、馬上結束戰爭等同起來。托洛茨基在齊默、瓦爾德——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這段時期之間為和平而進行的鼓動，是他作為積極國際主義者的化身時的第一個高點。對俄國是真實的東西，到後來，在更大範圍上，變成對整個歐洲也是真的。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會議桌上面對著德、奧軍國主義的代表們時為和平而作勇敢、挑戰性的鼓動，表達了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工人們的利益、感情和夢想。在歷史上第一次，要求“無條件、無例外、立即地停止戰爭”的呼聲，不只是來自鼓動家、理論家，而且是來自國家領導人。工人們的驚奇，他們的熱情、與他們的認同俄國領導人們，是無邊無際的。

這位先知仍然是沒有武裝的。從軍事上來看，革命仍然是脆弱的。它有被自大、強大的德國軍國主義者打敗的危險。但是這個沒有軍事力量的革命有一個秘密武器，這個秘密武器有一種異常的爆炸潛力——歐洲人民以及在各國軍隊中數目愈來愈多的兵士們對戰爭的厭倦。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談判桌上，以他全部的稀有的鼓動、修辭和辯證的能力，使用這個秘密武器。他超過談判者們，每天向東、西線上戰壕中的兵士們、柏林、巴黎、格拉斯哥和吐倫為數眾多工廠

中的工人們以及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巴塞羅那、阿姆斯特丹和蘇黎世的勞動人民說話。

傳統政治家和將軍們的憤恨，跟人民的熱情一樣大：“在這裡，托洛茨基悍然不顧所有的文明行為規則”。但是，他們的文明的懊惱，其實是戰爭的、屠殺人類的、蔑視人道的、猛增的野蠻主義的醜相。人民的反應，是對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代表的新文明自發的同情：和平的文明，人與人之間友愛的文明，自決權和人民權力的文明。〈7〉

在柏林、格拉斯哥和維也納都有自發的集體罷工。法國軍隊中發生了兵變。奧地利水手在卡塔洛暴動。雖然德國兵士和水手沒有發動兵變，他們卻聽到了托洛茨基所說的話，而這些話日後被他們記住。魯登多夫夫認識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真正勝利者是托洛茨基的時候已太晚了。〈8〉他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這個掠奪性和平所不得不付的代價是1918年10月/11月的基爾和柏林。

但是在這時候，歷史的辯證法起作用了，以致在幾個月之內，爭取和平的熱情的鼓動家變成了紅軍的創立人和領導人，而這個紅軍卻從一次血腥的內戰中崛起為勝利者。這是不是一次悲劇性的反轉，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一次內部矛盾的表現，如果不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所內有的一個基本矛盾呢？這樣一個解釋，只有在一次馬克思主義被人所錯誤地指責的那種直線、機械和命運決定論的基礎上，才會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為和平所進行的鼓動，在幾個月後才結出果實。因此，這個問題是具有決定性的。在這幾個月中，俄國反革命卻能夠組織、積聚其力量和武裝它自己。在這幾個月中，德、英、法、美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及其走狗們，卻能夠對沒有武裝的俄國革命像以捕食其他動物為生的動物那樣突然襲擊，而且把這個國家撕成粉碎。它就不是抽象原則的問題了。那時候的關鍵問題，就是在最狹義意義上的保護人命、自我保護和自我防衛。做一把斧頭或者鐵錘：德國社會主義者在1918年11月也面對同樣的選擇。他們沒有武裝他們自己，其結果就是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結果比俄國在1918年所面對的還要血腥。

但是，這幾個月嚴重的時間損失，並不是命中註定的，也不是革命兵士們什麼錯誤的計算。我們今天知道，部份由於所獲得的警察資料，在柏林和維也納發生一次反戰總罷工和反魯登多夫夫的掠奪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議的總罷工是一次真正的可能性。〈9〉

當時的托洛茨基比歷史學家願意承認的更為現實。

只有埃伯特及其一伙〔改良主義者〕的花招——在客觀上評價，那是背叛的，而且日後的歷史證明，那是自殺性的——以及剛剛興起的工人先鋒隊沒有能力有效地抗拒這些花招，才阻止了奧、德革命的火焰像日後的1918年秋天所發生的那樣，立刻爆發開。對於這件事情，歐洲的命運本來是要從負面來決定。但是，正面的後果卻為一個客觀的可能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建立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呢？它是不是，像盧森堡所說的，時機尚未成熟呢？這個問題，也不能用某些歷史命運論來答覆的。

在1919年初，許多事情仍然有可能向正面的方向發展。如果盧森堡沒被謀殺的話；如果德國工人階級在發動反對卡普政變的總罷工以前沒有經過一年時間的後退，而以一個階級的戰鬥達到它的戰鬥能力的頂點的話；如果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沒有把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置於困境的話；如果意大利北部的工人階級，像日後1920年那樣，在1919年的總罷工中達到如此高的戰鬥性的話，那末在1919或1920年在柏林建立一個第三國際就會是一個可能性，而這個國際就會圍繞著盧森堡所領導的斯巴達克同盟的領導層而建立起來，而且就會包括從USPD（獨立社會主義者）的左翼來的最重要的工人領導、具有採納真正的聯合陣線政策的心胸。這個國際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軸心，吸引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全世界工會運動中的全部左翼。

這樣一個不依靠俄國黨/國家機構的國際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當初想要建立的。在德、奧、匈的革命爆發以後，它是有可能建立起來的。這件事情沒有發生，是俄國革命以後的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的第二次命中註定的轉變。在那時的情況之下，一個以莫斯科為基地、與俄國黨政機構有太強烈的聯繫的國際，無疑地，是兩個選擇中較少壞處的選擇。像蘇聯本身一樣，它是一個等待的、維持現狀的運作，一個增進國際革命重新爆發的可能性的嘗試。一般說來，直至1924/25年以前，這就是它實際上所做的任務。

這就是托洛茨基在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評價他的角色和他的同志們的角色。他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為這個目的作出具體的策略建議——在卡普政變的時候，在三月行動的時候，在法西斯在意大利奪取政權的時候，在1923年10月德國暴動的時候，在英國大罷工、中國革命開始的時候。這些建議，不久以後，就陪隨著對因斯大林派的壓力而作出的錯誤估計和策略上錯誤的愈來愈尖銳的批評。這些錯誤，在以後，就在理論上和戰略上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共產國際的綱領中被一般化了。

到了這個時候，一些在性質上是新的東西出來了：

共產國際從一個世界革命的工具轉變為一個官僚的“保衛蘇聯”的工具，以後更轉變成為保護蘇維埃官僚層的特殊利益的一個工具。托洛茨基為了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工人階級的鬥爭組織所進行的戰鬥，為了一個真正共產主義國際的戰鬥，現在與他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合流了。

四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殺手謀殺以前，他說，在所有他對工人階級運動的貢獻中，他認為，他在1933年以後的活動，換言之，第四國際的建立，是最重要的貢獻，甚至於是比他之領導十月暴動或者他之形成不斷革命論這個為十月革命所作的理論準備更為重要的貢獻。〈10〉托洛茨基這段話，在今天，引起了最大聲的反對，最得不到人家的了解。然而，我深信，總有一天，這段話會被歷史所證實。他的聲明：蘇聯的官僚專政將會崩潰，需要一次政治革命來挽救十月革命的遺產和社會主義，也遭到同樣的反對，也同樣使人不相信。

短視的假現實政治的無能無力，換言之，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沒有像在對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作合適政治反應的問題上，如此毫不含糊地顯示出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是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骨架之內的國際化、日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內在邏輯所主宰的。在競爭和尋求致富、尋求利潤的推使下，這個過程正在採取越來越矛盾的形式，而且在較大程度上，正在發展出一個自我毀滅的動力。不終止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終止支撐前者的這個壓制人民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破壞性的潛力就不能夠受到控制。這個破壞性的邏輯將會繼續展開，像1991年海灣戰爭所清晰地顯示的，這是對所有那些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人們的幻想一個重大的打擊。〈11〉我們的時代的中心問題，只有在世界的規模上，才可以解決。新的世界秩序是無可避免的。這就意味著，結束國家主權，而這種終結，無論如何，正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自動、自發地發生。

民族國家的決定權的自動衰退，為某些社會力量，帶來了益處，為其他的社會力量，帶來了害處：對多國公司、大多數強大帝國主義國家有利，對較弱者不利。因此，全球化的自發過程，將不會無抗拒地發生。它的潛在的受害者將不會接受它們的被設計好的角色。它們的抗議、義憤、抵抗和反叛是必然的；強大帝國主義國家之傾向於以壓制和暴力來回應這個義憤也是必然的。

但是，由於現有水平的武器技術，大量使用武力，意味著人類將面對著越來越大的滅種威脅。因此，對全球化問題，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法根本不是一個解決方

法。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不是自動的、而是自願、自覺的限制國家主權。但是自願的放棄甚至局部的國家決定權，只有在所有的國家、國民和民族——不論小或大、富或窮、弱或強——都有最嚴格的平等權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假定弱國，雖然構成全世界人口的極大多數，會在較長時間內，接受任何其他限制國家主權的形式，則完全是烏托邦的。因此，目前的選擇，不是被最強大者所指令、所強迫執行的“新世界秩序”的現實政治或者威脅整個人類的越來越大的混亂。真正的選擇是，將會捲入全體人類的越來越大的混亂，包括因暴力地強加“新世界秩序”而起的混亂，或者以所有的民族平等、自願的合作為基礎的真正新世界秩序。

根據海灣戰爭的經驗，我們可以用聯合國的運作，來說明這個世界性的——有歷史意義的進退兩難。海灣戰爭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全體一致的決定之下開戰的。這個所謂“世界民族社區”卻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大勝利國有否決權：美、蘇（現時的俄國）、英、法、中。我們因此已經早就與所有國家的平等權利，有很大的距離。我們在這一點上加上以下的事實：由於蘇聯弱到不再是超級大國，英、法力量的衰退，中國的制度性危機和歐洲共同體不能創立一個真正的政治聯邦，美國之作為軍事霸權大國，已在安理會的“五強”中佔據了主宰地位。因此，安理會常設會員國的否決權已經在實際上變為美國的否決權。這在具體情況中就意味著，聯合國之採取軍事行動來反對違反聯合國決定的國家，只有當這個行動不與美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格林納達、巴拿馬、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帝汶。

印度尼西亞的壓制人民的軍事獨裁，在它的國家謀殺了近一百萬人，已給了這個世界自從納粹德國以來，唯一的屠殺人民的例子：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二百分之一人口已被殺死。這個集體屠殺已在多個場合中被聯合國嚴厲地譴責，至少像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之侵略科威特那樣地被嚴厲地譴責。但是沒有實際措施來對付印尼獨裁制度，既沒有抵制、封鎖，又沒有軍事干涉，因為這與美國的利益不合。

假定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世界大多數人民會容忍美國享有這樣一個自大的社會地位是不現實的。這裡必須立即提出的要求，就是立即廢除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一國一票——票數不能夠與金元、噴氣機的多寡成正比例。任何其他道路只會導致人類走向毀滅。這當然是一個過渡的、鼓動的要求。如果不在美國本土進行一次激進的轉變，這個要求是不能實現的。

這樣一個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平等的民族的自願合作的基礎上。唯一能夠保證和鞏固這樣一個新

世界秩序的社會力量，是工資勞動者階級。但是，工資勞動者階級只有在全球的規模上才能實現這一點，如果它已經開始獲得必要的經驗的話。工人們在國際規模上發展起來的、實際的合作經驗，將會是創立這個新世界秩序的一個絕對必需的學校和實際的學徒制。為了人類的生存，這樣一個新世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這個新世界秩序，我們稱之為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沒有一個新的群眾國際，就不會有真正的新的世界秩序。

通向這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道路是一條非常難走的道路。有許多障礙要克服，其中一個不小的障礙，是從所謂“國際”組織而來的災禍性的經驗。這些“國際”組織事實上是附屬於某些國家的利益的。要以國家為基礎的政黨，在國際政治的某些中心問題上，自動放棄決定權，將需要一段長時間。但是，希望它發生是空想嗎？這無論如何比決定核子武器、地球氣溫暖化，或第三世界的飢餓等問題將會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簡單的合作所解決，空想成份少很多了。但是真正的群眾運動、真正的群眾鬥爭結合成為一個真正的群眾國際，只有這樣一個國際集中精神來研究、解決世界無產階級的所有部份的最重要的目標和要求，才有可能。在今日世界上，群眾運動中有許多新的和不這麼新，激進派系。但是，除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國際以外，沒有一個派系無條件地支持第三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和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要求和鬥爭。那就是它的最大的力量；它是建基在里昂·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戰略的遺產和卡爾·馬克思的“直言命令”上。

爭取明天的群眾國際的時刻就是今天，而且可能是今後的一段非常長時期。這個鬥爭將會與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連在一起，而且包括許多形式的國際行動，和在聯合陣線的架構中與更廣大力量的合作。在這個具體意義上，托洛茨基在建立第四國際上的主動行動，事實上他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不但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綱領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延續性，因為這個延續性現在受到了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罪行的威脅；它也創立了一個組織骨架，在這個骨架中，一個以自願合作和一個共同綱領為基礎的、仍在進行中的共同活動，鍛煉了一群真正的國際主義的政治幹部。這群政治幹部，在許多遠遠超過了它自己的數量仍然微弱的組織範圍的政治生活中，實施一種可作為典範的、活生生的、不受到任何拘束的國際主義。

第四國際的數量微弱，常常受到人們的指摘。他們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第四國際能夠建立起群眾政黨。可是，似非而是的是，這個弱點，其實是常常被誇大的，卻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政治力量的泉源。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在數量上無可比擬地比第四國際大得

多。他們在工會中，在群眾政黨中、在好幾個國家中，有廣大的物質基礎。但是，這個大的物質基礎也包含了一個危險傾向：把國際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臣屬於在這些組織中正在發展的官僚機構的特殊利益。這種臣屬是一種強制的臣屬，是機會主義現實政治的一個產物。它已經變成越來越沒有原則了，而且甚至於在基本上非政治化了。

在較弱的第四國際中，黨員、支部對整個國際的臣屬是自願的，是純粹基於共同原則和共有的道德的委託——不是基於任何形式的物質刺激。沒有人是為了謀生之道而加入第四國際的。這種同質性是比其他兩個國際更堅定、更永久的，因為那兩個國際是基於權力，甚至基於金錢。對於第四國際的成員和同情者而言，自願放棄民族組織主權是理所當然的。

國際是他們的真正的祖國，比其他兩個國際的成員具有更深的意義。今天，“只有”數以萬計的人共有這個信念和委任。明天，在更大的國際中，它將會是，而且必須是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組織，如果人類不被毀滅的話。

註釋：

- <1> 帝國主義的這種奪取世界市場的特徵是，所貪求的統治權，決不包括拉平帝國主義國家與被統治國家之間的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反地，它造成了雙方之間的發展和福利水平，停頓在同樣的不平上，如果不是加寬的話。這種情況，在英國和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初階段就很明顯，在美國與南美之間也是如此。納粹帝國主義所設想的世界帝國，從開頭，就是要把整個民族轉變為窮苦的奴隸。
- <2> Jan M. Meizer所編輯的《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64年，第一卷，第625頁。
- <3> 《第一國際及以後》，倫敦，1974年第81頁。（中譯文採用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中文版第13、14頁）
- <4> 列寧遺囑中關於他支持格魯吉亞共產黨人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那一節，以及他的關於這個沙文主義對蘇聯與亞洲人民之間的未來關係的可怕後果的預言式話語，充分顯示列寧的國際主義。這兩段文字可在Moshe Lewin的《列寧的最後鬥爭》一書（倫敦，1975年）中找到。
- <5> 這並不意味著對於每個國家的階級鬥爭和工人運動的民族特性的否定或低估。它只意味著，隨著特定的民族目標和鬥爭形式，認知國際性的形式和目標，認知這些目標和形式也有一個特定的、獨立的動力，是必

要的。

- <6> 事後想來，列寧、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在大戰爆發時，沒有在第二國際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支持Hardie和Vaillant的在軍火工業、礦冶和運輸方面發動總罷工的建議，是否錯誤，至少是個有待繼續研究的問題。千真萬確的是，這樣一次罷工不太可能成功的。但是，在緊張的備戰時期，進行群眾性鼓動，將會給日後的群眾反戰運動一個具體形式。在實際上，這個反抗運動採取集體罷工的形式。諸如此類的群眾性鼓動也會加強了盧森堡自己的發動政治總罷工的運動。
- <7> 為數眾多的作者曾經說過，“世界革命完全是神話”。他們都忽略了一個簡單事實：在1916至1940年這段時期，在數以打計的國家中，發生了革命前夕和革命的群眾鬥爭。這不證明這段時期，與從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國革命這段時期不同，是一個國際革命和反革命時代這個結論是正確有理的嗎？真正使人百思莫解的是，這些作者為何否認這些事實，或不看重它們的重要性。
- <8> 見Erich·魯登多爾夫將軍的《Meine Kriegserinnerungen》（《我的戰爭回憶》）（柏林，1919年）。
- <9> 見羅斯多爾斯基在其柏林1973年德文版的《革命策略的研究》一書中的“1918年奧地利革命局勢與社會民主黨的政治、1918年的奧地利罷工”一文。
- <10> 見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記》，麻省1958年。
- <11> 我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爭論，可在我在1989年倫敦出版的《超越了改革，戈爾巴喬夫的蘇聯的前途》一書的第七章中見到。
- <12> 這並不意味著“共產國際主義”，換言之，國際“領導人”或“機關”對於民族政黨的策略或領導層所作的決定。第四國際的文告和實踐，是把各國支部在這方面的絕對自治，與對國際政策方面的主要問題（例如戰爭問題）的國際紀律的責任心結合在一起的。

更正：

本刊上期刊出這篇特譯的第一章時，其註釋<6>（見第35頁左排第4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應為「社會福利國家」，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來論) 蘇朵普拉托夫《特殊任務》札記

趙京

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至今還難信那麼強大的蘇聯會在十年前突然解體。關於蘇聯的歷史，除了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教材，赫魯曉夫的《蘇聯二十大秘密報告》，以及粗糙文學式批判（如《古拉格群島》）外，我們從來沒有機會讀到一本關於蘇聯政治實際運行以及其邏輯的報告。從這個廣泛意義上講，蘇朵普拉托夫的《特殊任務》（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e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是關於蘇聯國家體制的第一份英文公開史料。

蘇朵普拉托夫終生在蘇聯諜報系統（其名稱從「契卡」——肅反委員會，到KGB——國家安全部）服務，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務」局，指揮了抗德間諜戰、暗殺托洛茨基、竊取美國原子彈機密等至關蘇聯國家安全的行動，最後又目睹了蘇聯的解體。儘管他作為烏克蘭人為蘇聯賣命了一輩子，但因為他是貝利亞的手下，隨貝利亞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蘇聯解體才最終得到「平反」。

非常遺憾的是，儘管蘇朵普拉托夫在蘇聯解體後開始在俄羅斯媒介露面，接受採訪，發表文章，這本長達527頁的回憶錄卻是他的兒子與兩個美國記者根據他的口述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的。這嚴重地損害了本書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價值，需要讀者的判斷力。

此書的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缺陷是內容來源——一個中級蘇聯官僚的個人回憶錄。關於國家級別的事件，他的情報有限；關於諜報系統具體運行，他的立場不一定客觀（如贊揚貝利亞、貶責赫魯曉夫）。

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的精神：即一個蘇聯統治集團的一份子如何在斯大林體制下按照蘇聯的統治邏輯執行「特殊任務」的。這就不存在寫作語言與個人主觀性的缺陷，而且比那些受當時政治條件限制的國家級首腦（赫魯曉夫、朱可夫、戈爾巴喬夫等）的回憶錄、著作更有價值。

從本書的精神，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歷史

事件。例如：蘇聯官僚體制很實際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資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問題在於鬥爭中的領導權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殺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麥卡德）（宣稱）從西班牙內戰的戰鬥經歷痛恨托洛茨基派爭奪領導權，刺殺托洛茨基後被捕期間絲毫沒有洩露他受僱於蘇聯的身份。如何對待左翼反對派是一個關於蘇聯性質、蘇聯命運與社會主義前途的大問題。許多非托洛茨基派的進步人士都很遺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極端性助長了以後的斯大林體制的形成。*

蘇聯官僚體制對於斯大林與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確、實際。在經歷了侵略與包圍的生存權危機之後，終於有一個西方列強承認蘇聯也有權利加入列強、共同分贓，「何樂而不為」？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蘇聯的正確情報，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徹底征服蘇聯，而不向蘇聯進攻的話，斯大林可能漁利更多。既然蘇聯不得不採取與西方列強相同的邏輯，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以至雅爾塔分贓、操縱東歐各國政權，到最後在阿富汗的失敗，都出於同理。蘇朵普拉托夫作為蘇聯官僚的忠誠一員，雖然也吃到體制的苦頭，但從來沒有減退對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等首腦的崇敬：他們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弱國變成世界強權；相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人卻是敗家子，戈爾巴喬夫與謝瓦爾澤，把東德送給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終還埋葬了蘇聯。

蘇朵普拉托夫因為其妻子是猶太人，對困擾蘇聯社會的「猶太人問題」也流露出不少遺憾。

猶太人由於反對沙皇的政治傳統、較高學歷的職業背景等，在蘇聯建國初期佔據了許多重要職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個典型）。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猶太人也把美國與蘇聯連接起來。戰爭結束後，許多猶太人團體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尋求建立一塊「自己的土地」。在趕走韃靼人後的克里米亞半島上

建立一個「蘇聯猶太共和國」，以吸引猶太人控制的資金（不要忘記，斯大林、貝利亞等人任何時刻都想獲得外資以建設蘇聯），與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抗衡，成為一個誘人的設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國的以色列（美國甚至停止發放簽證讓猶太人入境）取得的軍事勝利打消了猶太人在蘇聯「建國」的希望。同時，蘇聯的上層內部權力鬥爭引發「猶太人醫生謀殺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終把猶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猶太人對於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貢獻非凡。

（我在美國接觸的一些從蘇聯移民來的猶太人，無一不痛恨蘇聯。）

出於擊敗德國的最高目的，猶太人竭力推動原子彈計劃。如果沒有愛因斯坦、費米（第一個成功實現核連鎖反應）、奧本海默（曼哈頓計劃主持人）等猶太人的參與，原子彈的製造會推遲許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學家中，包括丹麥的玻爾、德國的海森堡、蘇聯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學造福全體人類（而非某一國家）的理想，倡導由全人類共享「核機密」。蘇朵普拉托夫正確地把他們稱為「人類政治家」，蘇聯也正是利用了這個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彈研製。奧本海默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工作通過妻子、友人透露給蘇聯，直到最終被調離。玻爾除了寫信給羅斯福、面見邱吉爾要求與蘇聯「核交流」外，當蘇聯派人當面謀求指導時，他顫抖起來，卻最終同意回答了二十二個問題，加速了蘇聯原子彈的研製。蘇朵普拉托夫幸慶到：如果沒有這些不接受報酬的「情報員」的幫助，沒有核武器的蘇聯怎麼可能支撐幾十年的冷戰對峙？

當蘇聯剛解體時，不少樂觀人士都期待另一個超級強權會縮減軍備、順應和平潮流。但十年來的「後冷戰」卻證明「兩個魔鬼比一個魔鬼安全」，玻爾等人當初的選擇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舉。實際上，核武器從來不可能由科學家的良知來支配，以後的掌握核技術的科學家們，為了個人出頭，多賣身投靠國家政權。

我不由得回憶起，自己一九八〇年剛進入清華的工程物理系時，頗為自豪。因為核物理技術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唯一能夠與美蘇抗衡的王牌。但一個叫張靜波的北京同學要求調換專業，聲稱他「不願殺

人」。中國的教育系統哪能允許他「自由選擇」？他為了信念毅然辭走，第二年再考上一個「和平」專業。我至今還沒有抹消中國發展核武器的邏輯：我們正是因為過去沒有洋槍洋炮，才喪權辱國的。

蘇朵普拉托夫的這本書也透露了官僚階層對於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前途喪失信心，雖然他本人隨貝利亞垮台而遭逮捕，他為之賣命的這個體制在後期冷戰中的經濟競爭、「人權外交」中的失敗已經注定。現在看來，這個體制居然能維持到一九九一年，多半還歸功於其對手的霸權行為鼓勵。

二〇〇一年四月八日

*編者按：我們對這句評語有不同的看法，依照我們對有關歷史事實的了解，斯大林官僚體制的形成，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民主主張、托洛茨基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官僚主義的言行，既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完全相對立的。斯大林在列寧死後篡奪了布黨和國家的實權，把布黨改變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使蘇聯成為官僚墮落的國家，這些都不是由最先而且不可調和地反對斯大林官僚體制的托洛茨基所助長的。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3428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in China

-- on the eve of the 12th anniversary of June Fourth

Zhang Kai

On the eve of the 12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June 4 Crackdown, let us review the course of struggle of the people of China in fighting for democracy and better livelihood, and unveil the crimes of the regime's repression of militant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has been deteriorating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ignator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charges of "subversion of the regime" or "leakage of state secrets" have been used in the arrest of dissidents. The following are some instances.

1. Repression of the right of pub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Journalists, just last year alone, as many as 22 journalists were detained in China, the highest number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Director of a web site Huang Qi was arrested for publishing news about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last year before June 4, and was tortured in jail. He was formally prosecuted in February this year. Yang Zili, computer engineer graduated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was arrested by the State Security Bureau for posting essays for liberalism on a website.

2. Stepped up repression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Falungong and Zhonggong, and arrests of Falungong practitioners who demonstrated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Many were sentenced to several years of imprisonment.

3. Continued repression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formation of parties. Over 30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have been jailed. Shan Chengfeng, wife of Wu Yilong,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petitioned the Olympics Association jointly with 28 people requesting the Olympics Association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detain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She was herself arreste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nd sentenced to two years of "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in February this year. Chen Zhong and Xiao Shichang, both members of this party, were sentenced to 7 and 5.5 years of imprisonment by the Wuhan Municipal Court on the charge of "subversion" on 7 July 2000.

4. Continued deprivation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Jiang Qisheng, leader of the students' delegation requesting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1989, was again arrested for writing to ask for rehabilitation of June 4, and sentenced to 4 years imprisonment. A lawyer in Henan Province, Shen Hongqi, sent two essays in favour of democracy, and was sentenced to 3.5 years imprisonment.

5. Tightening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freedom of research. A number of academics have been arrested, such as some from Hong Kong and abroad: Xu Zerong, Tan Guangguang, Gao Zhan, Li Shaomin, Wu Jianmin. Despit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hey have not been released or put on trial. According to the China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re, from July last year to the present, 24 scholars or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State Security Bureau. In Beijing, three fresh graduates, Geng Haike, Xu Wei and Zhang Honghai, were recently arrested for setting up an academic organization The New Youth Study Club.

The fear and sense of insecurity demonstrated by the regime may be reflected and evidenced by the following general social phenomena.

Firstly, social order is worsening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is aggravating. According to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on April 5, criminal cases under police investigation in 2000 was 50% increase over 1999. Experts are saying that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fourth crest of crimes since the first one erupted in 1983.

Secondly,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reform is causing more workers to be laid off. According to the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Li Rongyong, in a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rch this year, altogether 21 million workers of state enterprises had been laid off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7 million of them have not yet found another job. Zhang Zuoji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said that in the next 5 years, an estimated 52 million population will be looking for employment, and 10 million will not be able to find a job. Th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for cities and towns will rise from 3.1% last year to 5%, and there will still be 40 million rural population transferring to work in rural industries or the cities and towns.

However, these official figures do not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nfang Weekend magazine of Jan 18, Ma Ke's essay quoted experts from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as estimating that the real unemployment rate in 1997 was 9.36%, and in 2000, it should be over 10%.

A research on the basic condition of workers con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Nanchang showed that for the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of laid off worker families, 79.2% of the families had less than 300 yuan (US\$1=8 yuan), and 36.7% had less than 150 yuan. A considerable number in this social category have fallen to absolute poverty.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of poor families, those with their household heads working in state enterprises amounted to 53.9%, pensioners amounted to 16.7%, and those who worked in collective units amounted to 16.5%. With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any of them suffer seriously from poverty.

Thus, worker strikes and protests have been very frequent. Some of the known ones are: on 27 Nov 2000, 12,000 workers of the Youli Electric Factory (with Japanese investment) went on strike, protesting tha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work 12 hours every day and the hourly wages were less than 2 yuan. Workers had requested to form a union before the strike, and after the strike, there we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n Nov 28, over 1,000 workers from Anhui lay down on the railway to protest against unpaid wages and layoffs, paralyzing rail traffic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for 8 hours. They were removed from the railway track by the police. On Dec 21, several thousand miners and family from three mines closed by the Xingzi Mining Bureau riot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abour Bureau, there were 120,000 cases of labour disputes in 2000, 14 times over 8 years ago. On Feb 2, 2001, a worker activist Li Wangyang went on hunger strike in a hospital in Hunan province. On March 6, over 1,000 workers in Shanghai took to the street against layoffs. On March 26, 1,500 workers from Guiyang City, Guizhou Province, blocked major roads in the city, while 500 workers from a chemical fertilizer factory in Henan Province demonstrated outside the Xinye County government house, both protesting against unpaid wages for a year. On April 23, several dozens of workers from Jilin Province and Liaoning Province went as a group to Beijing to stage a sit-in strike. On March 13, 5,000 taxi drivers from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besiege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e. 7,000 drivers had earlier on started a slow-down drive. Wang Deming, a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mber, remarked that the number of worker and peasant strikes at the level of municipality or above has been increasing by 37% per annum.

Peasant riots and protests are also frequent. On April 15 this year, over 1,000 villagers in Yuji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staged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military police. They had refused to submit tax for a few years. In the confrontation, 2 peasants were shot dead, 18 were wounded.

With social grievances growing and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for control reduced, the Chinese regime may end up taking the path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USSR.

4 May 2001

目錄

香港	2	亟需制訂最低工資等法例..... 振言
	4	團結起來，爭取全港普選特首！..... 本刊評論員
	5	抗議判處三名「街頭戰士」入獄..... 聯署聲明
中國	6	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和鬥爭..... 張開
	9	致江澤民促即釋放三位學者的公開信..... (轉載) 375名國際學者
	10	抗議中國國安部隨意抓人..... (轉載) 于浩成等13人
	11	從撞機事件看中美關係..... 軍行
	12	中國發展路途多阻..... 邁登
國際	15	越南的勞務輸出醜聞..... 黃申輯譯
	16	哈薩克斯坦左派和工運近況..... 肖軍輯譯
	17	21世紀匈牙利左派巡禮..... 安多爾
	20	梵蒂岡為反猶教皇行宣福禮..... 雷特
	21	華爾街的經濟持續增長之夢..... 溫斯坦
	23	資本主義的環境危機..... 謝潑德
	26	資本主義新生產秩序誕生了？..... 威爾諾
特譯	33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二)..... 曼德爾
札記	41	蘇朵普拉托夫《特殊任務》札記..... (來論) 趙京
英譯	43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in China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8 ISSUE 2 2001.6.1

HONG KONG

- 2 Legislation on minimum wage is much needed..... Zhen Yan
4 Unite for popular ele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 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5 Against jailing of 3 protesters..... joint declaration

CHINA

- 5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 Zhang Kai
9 Open letter to Jiang for release of 3 scholars..... (reprint) 375 scholars
10 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 (reprint) 13 people
11 Plane collision and Sino-US relation..... Jun Xing
12 2001: a Chinese odyssey..... L.Maitan

INTERNATIONAL

- 15 Vietnam: labour export scandal..... (tr) Huang Shen

- 16 The Khazakstan left and workers movement..... (tr) Xiao Jun
17 The Hungarian left at the millenium..... L.Andor
20 Vatican blesses anti-Jewish Pope..... P.Reid
21 Wall St dreams of permanent economic expansion..... N.Weinstein
23 Capitalism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R.Sheppard
26 A new productive order?..... H.Wilno
33 Trotsky as alternative (2)..... E.Mandel

BOOK REVIEW

- 41 *Special Tasks* by Sudoplatov..... Zhao Jing

ARTICLE IN ENGLISH

- 43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in China..... Zhang Kai